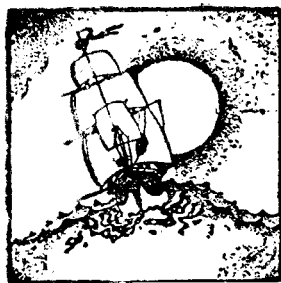


岸踪集

集 二

著 奮 韜



月一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萍踪寄語二集弁言

萍踪寄語初集裏的材料，因為那時要應生活週刊按期繼續發表的需要，所以在途中隨時就觀察所及，即握筆敘述。今年二月間，記者由英動身，經過法國、比國、荷國，而達到德國，在這三個月的旅程中，只留意材料的搜集，到了英國以後才組織起來追記的，這本萍踪寄語二集便是這樣寫成的。

記者出國以來，國內有不少直接間接的好友，輾轉寄信來慰問，這是記者所銘感不能忘的；有的還問着「寄語」久已未見，「萍踪」漂泊何處，承蒙好友們這樣殷殷地垂念，我只有愈益感奮。我此次雖負債出遊，但是有朋友們許我負債，比之一籌莫展的，仍是幸運多了，所以我於愧怍之餘，一面想乘此機會把自

已充實一些，以作繼續爲社會勉竭駑駘的準備；一面仍時常不忘須就淺見所及記些出來向垂念我的好友們報告報告。

但是記者常恨自己學識的淺薄，出國後，尤覺好書不勝其看，良師益友談話不勝其談，事物不勝其觀察，直像餓鬼看見了盛宴佳餚，來不及狼吞虎嚥似的；而知識無限，浩如煙海，愈深刻地感覺到自己學識的淺薄，也愈迫切地覺得時間的不夠用。因此在這樣短促時間裏，本想暫時擱筆；但是上面所謂之「時常不忘」的意識又常在督責着自己，所以特開「特別快車」，差不多在一個月內，把這本以德國爲段落的萍踪寄語二集趕成，以求好友們的指教；並欲藉此最近的「寄語」，奉告最近的「萍踪」。這不能算做什麼著作，聊當面談而已。

記者於這本第二集「寄語」脫稿以後，將往蘇聯去看看，大概本年九月底可遣回倫敦；倘有所得，當再就「萍踪」所到，寫些「寄語」出來，以擾好友們的

清聽。

韜奮記於倫敦。

一九三四，六，九，夜。

目次

五二	再到巴黎·····	一
五三	遊比雜談之一·····	九
五四	遊比雜談之二·····	一八
五五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二六
五六	荷蘭的商業首都·····	三七
五七	一個從未和中國人談話過的德國女子·····	四六
五八	所謂領袖政治·····	五三
五九	褐色恐怖·····	七〇
六〇	種族的成見和夢想·····	七六

六一	經濟的難關——失業問題·····	八五
六二	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	九四
六三	德國新聞業的今昔·····	一〇〇
六四	南德巡禮·····	一一四
六五	遊德餘談·····	一二六

五二 再到巴黎

記者自今年（一九三四）二月七日把關於英國的「寄語」結束之後，這兩個多月以來，「萍踪」又由靜而動，由英而法，由法而比，由比而荷，由荷而德，持筆續寫這篇「寄語」時，已由德國回到出發點的倫敦了。我現在的職責就是要陸續把這兩個多月來的聞見和感想，報告給生活週刊的讀者和朋友們。（記者記此時，雖已很痛心地知道生活週刊被迫停刊了，但我深信生活週刊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的，因為牠所反映的大衆的意志和努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消滅的。）

巴黎爲記者舊遊之地，關於法國的情形，也已略有所述，此次由倫敦出發，注重在考察德國，順便看看附近的比利時和荷蘭兩國，但因爲有幾位在法的生活

的好朋友在我上次到法時，忽忽未及晤談，墜囑再灣到巴黎幾天，在我也因為上次因要趕赴倫敦大學開學的日期，關於巴黎還有幾處要看而未及看的地方，加以正在我想去的時候，巴黎剛在史達維斯基(Stavisky)大弊案發現後，政潮洶湧，鬧得烏煙瘴氣的當兒，新聞記者是愛管閒事的，也想藉此機會去瞧瞧向佔歐洲所謂『民主政治』第二把交椅的法蘭西。

法國的開潮，向來是有名於世的，自世界大戰到最近杜美格(Doumergue)在大擾亂中起來組閣為止，不到二十年，已有了三十一次的內閣，有的內閣成立幾天就短命，有的剛成立就倒，但雖起來倒去，而政策却差不多，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尤顯著的是對外的政策，政黨雖有左右派之稱，左派最大的黨是所謂激進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 Party)，其實既不『激進』，也和什麼『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是道地十足的一個布爾喬亞(Bourgeois)的大集團，所以翻來覆去，都不外那一套『換湯不換藥』的玩意兒！史達維斯基的大賄案，和這次內閣

及衆議院的大坩台，固爲所謂「民主政治」者多露一次破綻，加上一道催命符，但政權既仍在布爾喬亞的手裏，雖一時鬧得怪好看，根本也就不過那麼一回事罷了。

在這次政潮中，有兩件小事頗堪發噱，一件是法國行動黨（Action Française 卽保皇黨）的機關報對曾任外交部長的政界要人彭古（Paul Boncour）大開玩笑，彭古本屬社會黨，後來因爲和激進社會黨的領袖赫利歐（Herriot）合作，遂脫黨，據說他曾經做過史達維斯基的嬌妻愛勒特（Arlette Simon）的律師，非常要好，甚至說和她有過什麼特殊的關係，自從這個大賄案發生之後，法國保皇黨的機關報每在新聞裏有提到彭古名字的時候，總把愛勒特加在彭古的名字裏面，成爲 Paul-Arlette Boncour，竟把他的尊姓大名這樣地改造了！

還有一件事是這樣：這次法國政潮弄得滿城風雨，在街道上打得頭破血流，前總統杜美格退隱在鄉間裏，被現任總統強請出來組閣，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翁

了；在這個時候，比國的國王亞爾培（Albert 1875—1934）爬山跌死，他的兒子利阿波第三（Leopold III）隨即承繼王位，法國的保皇黨看了在機關報上大放厥辭，說這種制度多麼好，嗣王年青有爲，承繼王位的手續又省，何必像法國還要那樣跑到鄉間去拉出一個快要死的老頭兒來，多麼費事，中國話有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人的見解，往往很容易受他的背景所蒙蔽，這樣的情形被保皇黨看見了，便認爲是他們所以要「保皇」的十足的理由！

這次再到巴黎，補看了好幾個地方，現在撮述一二附記在這裏。一處是衆議院（Chambre des Députés），這裏面的情形，和在倫敦所見的衆議院似乎不同。英國的衆議院的議廳是長方形的，議員座位是同置在一個平的地板上；法國的衆議院的議廳却是半圓形，議員的座位是一排高一排，半圓形地排在議長席的前面，建築似乎比英國的宏麗，尤不同的是他們開會時的情形，在英國的衆議院開會的時候，秩序比較好，一人說話未完時，別人很少起來插嘴，講到得意時，本黨的

人也不過附和急叫“*heari heari*”罷了，記者曾在該處旁聽了一小時之久，所見都是如此；在法國衆議院裏所見的却有些不同，我在四月二十日那天下午五點鐘前十分到那裏，五點鐘起開始開會，五點四十分即閉會，簡直是四十分鐘繼續不斷的一場大吵鬧，本黨人發言，本黨的議員大鼓其掌，反對黨的議員便同時你一句我一句插着大聲瞎鬧，此時最難做的是議長，拿着一個戒尺在桌旁打着，不行，就大搖桌上的鐘，（這鐘的聲音，好像救火車在馬路上駛過時的鐘聲一樣，）有時可因此略停數分鐘吵鬧，不久又鬧做一團；有時連這幾分鐘的效驗都沒有，議長好像氣得發昏的樣子，只得儘他們提高嗓子大鬧着，待其自然的停止，不久又鬧了起來！據久在法國的朋友說，衆議院裏這樣鬧做一團的情形是常事，有時大鬧不停，議長無可如何，只得暫時退席以避之，因為議長走了，會議便等於暫停，大家得隨意離席，暫作鳥獸散，鬧的人也就鬧無可鬧！那天所議的是通過財政預算原則案，政府派希望大體通過，反政府派主張須逐項付議，結果是政府派

佔了勝利。那天旁聽席上的人很多，大家看着那樣鬧得不亦樂乎的樣子，都忍俊不住的大笑。這全部分的四十分鐘，就沒有一刻不在這樣吵着叫着鬧着笑着裏面過去。我出了衆議院的門口，還獨自一人對自己發笑着。

在倫敦和巴黎都各有一個蠟人館，在倫敦的稱爲杜索夫人的展覽會 (Madame Tussand's Exhibition)，在巴黎的稱爲格雷溫博物院 (Musée Grévin)。(都是以創辦者的名字爲名。)所謂蠟人者，並不是全身都用蠟做的人像，却是用蠟做的人頭，人手，裝在穿着真的衣服的身體上，(這身體當然也是造成的。)就是面上的眼毛或鬚子，頭上的頭髮，也和真的一樣，人身的大小和真的人一樣，所以看的人廁身其間，竟好像鑽進了人叢中。其中有的是現在還生存着的，有的是剛死的，有的是死去多時的了，好像古今生死同聚一堂！各國歷史上及現代最著名的人物大概都有，例如美國有名的總統，就有幾十個躋在一處，有坐的，有立的，此外如文學家，藝術家，飛行家，電影明星，乃至運動健將，如網球健將

之類也有。尤有歷史意味和價值的，是若干幕歷史上引人注意的事件，例如拿破崙臨終，羅蘭夫人受審等等的全幕人物布景，用各色電燈陪襯，令人如身臨其境。倫敦的比巴黎的好。在倫敦的蠟人館裏，還在地窖裏布置許多被監禁或槍決的著名犯人，陰氣逼人，如遊陰間。（這是想像之辭，並非記者相信有陰間，更未曾遊過陰間。）在入口處，就有一個殺了頭的人身，旁立着迎接你！在第二個門口上，旁邊有個穿制服的青年閉眼坐着，看上去和別的蠟人一樣，大家都不以為異，等圍看的人略多，那個人忽然立起來，弄得大家驚嚇一跳！裏面有個『鴉片窟』布置着一個拖辮子的中國人服侍兩個英國水兵吃鴉片。那個中國人只有一根辮子，和短衫褲子算是他的特徵，那個面孔仍是西洋人的面孔，但在這樣富有民衆教育意味的機關，替中國人丟臉也就夠了！從前有位朋友滄波在他所著的倫敦閒話一文裏（見生活書店出版的深刻的印象一書），曾提及該館裏關於中國名人的像，就只在一個屋角裏看見被稱爲『廣東的省長』，『型像面色特別黃

黑」的中山先生。我去看時，已找不到，大概他們把「廣東的省長」都取消了！留下來的就只有那位拖着辮子服侍兩個英國水兵吃鴉片的仁兄！在巴黎的蠟人館裏，關於中國的只有一幕所謂「中日之戰」，是日本人打長城的布景，其中中國長城上竟闕無一人，不知道他們是否認爲這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象徵！

我從另一方面想，我們自己倘能設立一個蠟人館，却很有民衆教育的價值，至少可將歷來爲革命而犧牲的許多烈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後，慷慨起義，臨危捨命的種種慘狀，把牠們好好的佈置起來，使人常常想到許多烈士的慘痛犧牲，現在所換得的是什麼？尤希望那般拿革命做幌子而窮奢極慾無惡不作的高官顯要們能有看到的機會！

關於巴黎的「玻璃房子」，以前不過聽人談起，還沒有工夫去看，這次再到巴黎，也抽暇去參觀一下。我和一位朋友於一個夜裏去看，到後照例叫了兩杯酒，和朋友圍坐在一個桌旁，有幾十個赤身裸體的女子來周旋，有一個挨到我的

身上來做盡媚態，勸『開房間』，她——可憐的她——此時眼中所看的是法郎，心裏所想的是法郎，無所不可的都是爲着法郎！到了這樣情況之下，什麼美的觀念都沒有了，我和那位朋友坐了不到五分鐘，連酒都沒有喝，就忽忽地離開了這『人間地獄』。

一九三四，五，三，記於倫敦。

五三 遊比雜談之一

在歐洲的北部海岸，法國和德國的中間，有兩個小國家，那就是比利時和荷蘭。這兩個小國的人口都在八百萬人左右，是在歐洲經過戰爭最多的一塊地方，這不但是因爲這一塊地方的南部（即比利時）是正夾在法德兩大國的中間，爲這

兩大國擴充地盤時常爭的地帶，而且也因為這兩小國有了歐洲最重要的幾條河的出口，爲鬭爭的媒介。但這兩個小國家雖被人加上一個『小』字，在你搶我奪的這塊地方上，居然能靠着自己鬭爭的力量，終於能維持他們的自由平等的地位，（當時的國際形勢當然也有關係，但根本還是靠自己鬭爭的力量，）這時來自『大』國的我，來自『大』而任人宰割的中國的我，到這兩國裏看看，實在沒有法子消除我的慚愧的心影。

記者於二月廿二日上午九點十五分由巴黎動身，十二點便到了比京布魯塞爾 (Bruxelles)。在火車裏遇着一位荷蘭老者，和他的妻子，同坐在一個車廂裏，他們倆的頭髮都白了，至少都在六十歲以上的年紀，而體格康健，却無異於四十年左右的壯年。這老者能英語，我和他談話之後，才知道他在荷蘭經營船業已四十年了，聽他的口氣，好像是一個輪船公司經理，我問他荷蘭船業最近情形如何，他說沒有一個輪船公司不蝕本的，現在只得勉強維持現狀，以待轉機。我們

知道荷蘭的國力，最倚靠的是他們的商業，尤其是航業；荷蘭的航業到現在，雖遠不及十七世紀獨執世界牛耳時代，但仍佔很重要的位置，他們靠着均衡入口的差異，這是最主要的要素，但據這個經營船業四十年的老者說，現在却沒有一個輪船公司不蝕本的，這也是因為他們逃不出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

在國外遇着外國朋友，十八九要問你中日問題怎麼樣了，這個老者也不能例外。他似乎很抱憾地說，中國不能打，最沒辦法，我便把十九路軍在淞滬打日軍情形告訴他，他聽得津津有味，隨聽隨譯給他的夫人聽。我想，我們還有十九路軍拿來遮遮面孔，但以偌大的中國，只有這曇花一現的十九路軍，這面孔還是遮不了！

記者到比國的時候，正值他們一「喪」一「慶」的當兒。我到的那一天（廿二日），是爬山跌死的比王亞爾培大出喪的日子，也就是他們的國喪；第二天是比國新王利阿波爾第三宣誓登位的日子，也就是他們的國慶。在這兩天，滿街

人山人海，北京附近各城的人都特爲跑來看熱鬧，我就好像看了「比國人民展覽會」。在新比王和他的王后的『變駕』經過街道的時候，兩旁擠得水洩不通的人羣中，都揮巾或揮帽歡呼，有的在最後一排的角落裏，一點兒看不見國王或王后的臉，也大脫其帽，這種敬重王室的心理，在我們看來真覺莫名其妙。比王未葬前，陳尸三日，一任人民觀看，各處人民到北京列隊循序進去觀看者，每日十餘萬人，聽說有的看了流着眼淚，有許多情願餓着肚子，或一夜不睡，列在隊中站着，等候進去一看。這裏面大概爲好奇心所衝動的也不少，不過據說比王亞爾培在國王中算是很忠於國事和愛護人民的，所以確也留下了不少的哀思。

現在比國的政治和外交是惟法國的馬首是瞻的，所以法國的政治如果沒有什麼大變動，比國的政治也就亦步亦趨，不會有什麼大變動。比國的政黨有天主教黨，裏面包括的是教徒，農民，資產階級；自由黨，裏面包括的有財閥，工商界的領袖，和一部分的智識階級；社會黨，裏面包括的有工人，由智識階級中人如

大學教授，律師，及其他自由職業者做領導；共產黨；勢力以天主教黨和社會黨的爲最大，但經濟實力操在自由黨的手裏，現有的局面，是天主教黨和自由黨聯合戰線壓倒社會黨，前兩黨爲在朝黨，後者爲在野黨。在這種形勢之下，政治上大權握在什麼階級的手裏，可不言而喻了。共產黨在國會裏也有兩三個議員，當廿三日那天新比王在國會裏宣誓時，各黨議員呼國王萬歲，共產黨議員則大呼『民國』萬歲，大家也莫奈何他們，這如在以『馬氏文通』觸犯刑章的國家裏，當然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講到經濟方面，比利時是歐洲最工業化的國家裏面一個老資格，列日 (Lille) 的煤，在中世紀就有名的，鐵和鋼的工業，在十八世紀的末葉就發展了，現在這三種工業仍佔最重要的位置，此外關於鋅，鉛，玻璃，紡織，也有大量的生產，從事農業的人民不到五十萬人，從事工商業者却在二百萬人以上。自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愈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倒霉的程度也愈高，比利時雖向來

有富庶之稱，也不能例外，試看他們的統計，一九三一年工人失業人數爲二十萬零七千人；一九三二年增至三十五萬人了；一九三三年增至三十八萬三千人了。所以在比國布魯塞爾極寬敞平滑的馬路上，兩旁的洋房和樹蔭多麼美麗，你在這美麗的環境中就可發現着衣服破爛的變相的乞丐，有一個清晨我和老友寄塞伉儷同在這樣的一個道旁散步，就兩次遇着這樣變相的乞丐，手裏拿着幾根鉛筆，伸着手向你要錢。其中有一個還有羞答答的樣子，大概是初上任的，還沒有得到多大的經驗！據寄塞說，這都是失業的工人，在兩三年前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布魯塞爾有『具體而微的巴黎』“The Miniature Paris”之稱，居民八十五萬人，街道整潔，建築美麗，市政修明，確很可引起人們的美感，但比巴黎當然尙望塵莫及。建築物以大理院（Palace of Justice）爲最宏偉，價值六千萬佛郎，佔地比羅馬的聖彼得教堂的地盤還大，歐洲的宏偉建築物，最多的是教堂，其次是皇宮，此外則大理院也常夾在裏面湊熱鬧，爲遊客常到之處，在我國，遊客要

特跑到審判廳去看看，大概很少。布魯塞爾比巴黎，『微』則有之，『具體』還說不上，不過有一件事却不很『微』，那就是在熱鬧街市如 Boulevard Adolphe-max 一帶，華燈初上，野雞如鱗，我和寄寒伉儷及王君勤安等順道過此，目見甚多。據說野雞之外，還有不少公娼，那更可和巴黎分庭抗禮了！

記者在比雖僅前後四天，除到魯文 (Louvain) 半天外，承蒙寄寒伉儷差不多天陪伴着遊覽，所看的地方不少，比較重要的是他們博物館的設備，國家雖小，對於民衆教育的努力並不小。在同往參觀歷史博物館的那一次，在同時遊客中有三個美麗活潑的比國少女，（依中國女子標準看去有十六七歲，在她們身體發育健全，據說實際都還不過十三四歲，）其中有一個尤秀媚，忽對我們幾個外國人注意，跟着我們一塊兒看，最後臨別時，彼此分開了，她們還回過頭來嫣然對我們說『再會』，我們也欣然還報以『再會』，雖心裏明知道這『再會』是大概絕對沒有希望的。可是那天真少女的美感，至今還縈迴腦際。

比國的最大的殖民地是在南非洲的剛果 (Congo)，在北京時也特地去看了他們的殖民地博物館，內容是動植礦物的生產之豐富，同時用相片和模型表示土人之野蠻和迷信等等文化落後的情形，受盡了種種的搾取剝削，還落得個不名譽的結果！比時本國的全部面積不過一萬一千餘方英里，而比利時的殖民地剛果却有九十萬餘方英里，大了九十倍左右！

在北京也有所謂『無名英雄墓』，即在世界大戰中陣亡兵士的墳墓。在馬路上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不但走路的人都自動地脫帽致敬，就是在電車裏的乘客，也都自動地脫帽致敬，這也可見一般民衆教育的程度。記者也路過幾次，尤其令人連帶回想的是一九一四年蕞爾小國的比利時因德國侵入國境而英勇抗戰的經過。德國原答應比國如許他們假道，決不侵犯，而比國毅然不許，當年八月五日，德軍開始攻擊，比將勒孟 (Leman) 率領比軍抗戰四倍人數的德軍至四十八小時，最後因避包圍，退至 Fort Loncin，仍收拾殘軍抗戰，堅持一週之久，勒孟

戰倒於殘墟中，昏迷失却知覺，被德軍擄去，此役比軍死亡四萬八千人，德政府第二次提出要求假道，仍被比國拒絕，以後的情形，讀者諸君都知道，用不着記者贅述。總之德軍絕對不得在比國『不抵抗』中爽快通過，要進一步，便須吃進一步的苦頭！當年十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德軍要通過比國的野塞河（Yser）被比軍作十餘日的死抗，比軍死亡一萬四千人，其英勇尤為歷史上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頁，比軍堅守這一小塊僅餘的國土，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終了時為止，未曾被德軍佔去，暴敵侵入國境是什麼一回事，還有什麼苟安圖存的餘地！比利時雖是蕩爾小國，她所以能卓然立於世界，也全靠這一點英勇抗戰令人不敢輕視的精神。當時毅然主持抗戰的比王亞爾培和首當其衝而死抗到底的勒孟將軍所以能留永思於比國人民心中者，不為無故。

五四 遊比雜談之二

比利時是在歐洲經過戰爭最多的一個地方，這在上面已提及，滑鐵爐（Wallerloo）之戰，也是這許多戰爭裏面最著名的一個。記者曾於三月廿三日午後，和寄寒伧僱偕往滑鐵爐一遊，整整費了一個半天的工夫。滑鐵爐是一個居民僅有四千人左右的小村，在比京布魯塞爾之南十一英里，由布魯塞爾去，乘一小時的電車可達。在一八一五年的六月，這是英將威靈頓（Wellington）駐紮抗戰拿破崙的地點，拿破崙以神出鬼沒的戰術，懷囊括全歐的野心，幾於所向無敵，最後經滑鐵爐一敗，真是中國話所謂「一敗塗地」，皇帝沒得做，關到聖嚇倫那（St. Helena）島上去，五年後便以一死了之。在當年六月十八日那天交綏的處所，就

在這滑鐵爐村上一個小墩名叫 Hougomont 的上面開始，現在僅是一個農場，設有一個陳列館，陳列關於該次戰爭的遺物，在樓上有個圓形的大畫室，却很別緻，中間一個大亭，亭的周圍有圍欄，圍欄外面離七八丈的周圍，便掛着高十餘丈的大油畫，圍着這個亭子。油畫的內容是描寫當時聯軍和拿破崙軍隊交戰的情形。油畫的下面和亭外的空地接連，在地上使用真草，真茅屋，以及逼真的人馬槍礮等等的模型布置着，油畫的上面是畫着蔚藍的天空，和亭子上面接連着，全部用電燈襯托出來，使看的人從亭子裏看出來，好像身臨戰地似的。除這個陳列館外，還有一個紀念此次戰事的人造的獅子山 (Mont du Lion)，這山是比利時於一八二三年及二六年間造成的，山高約一百五十尺，周圍約一千七百尺，頂上中間有個鐵鑄的大獅子，二十四噸重，從山下可由二百廿六級的石級登到獅子的座子，座子周圍及石級兩旁都有鐵欄杆圍着。我們三個人都鼓着勇氣爬到最高頂去遠望了一番，這附近的四圍便是數十萬大軍搏戰之地，便是叱咤風雲一世之雄的

拿破崙大吃敗仗的所在！天已漸漸地陰暗起來，匆匆下山回來，在電車裏已是萬家燈火了！

看到這個戰地，使我回想到歷史上關於此役有件趣事，那便是拿破崙自信必勝，唯恐威靈頓乘夜不戰先逃！在六月十七日（一八一五年）的那個夜裏，威靈頓和拿破崙的兩方軍隊均駐紮在滑鐵爐，等天明交戰。拿破崙把勝仗拿得十穩，深恐威靈頓在當夜乘黑暗中逃走，特於這個夜裏——已經半夜了——離開他的居屋，只帶着柏塔郎大將（Marshal Bertrand）一人相隨，步行走出他的禁衛線，竟大膽地走到威靈頓駐紮地的前面，周圍的叢樹附近。這時已是夜裏兩點鐘了，拿破崙在萬籟俱寂中傾聽，忽然聽見有一隊敵兵在黑暗中的步伐聲，他想這一定是威靈頓乘夜裏黑暗中拔營，這一營大概是他的最後的衛隊了！他此時絕對夢想不到第二天威靈頓的軍隊會那樣的死抗不退，雖以拿破崙的將才一有輕敵之心，也免不了大吃敗仗，這倒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

記者於三月廿四日的上午費了半天的工夫去參觀比國一個文化中心的魯文，有『比利時的牛津』（“The Oxford of Belgium”）之稱，由比京乘火車去，不及一小時即到。魯文是屬於比利時的卜拉邦（Brabant）省的一個城鎮，居民約有四萬人，而在該處的魯文大學的學生却有五千人左右，所以滿街隨處可以碰到男女大學生，他們或她們雖穿常服，却都戴有不一律的制帽，各科各級的學生，都各有其特殊顏色和標誌的制帽，使人一望而知，有的制帽像我們所常見的睡帽一樣，各學生同時是什麼學會或團體的會員，還把許多金的或銀的五花八門的徽章插在帽上的周圍，很特別。該校雖男女同學，向例男同學和女同學不得兩個人（即僅僅一男一女）在街上同行，否則一被學校當局看見，即須傳去問話，麻煩得很，所以在街上確看不見有這樣的現象，頑固習俗可笑，究竟不知道有什麼充分的理由！該校以醫工較著名，中國留學生有二十餘人，前大晚報記者張若谷君也在該校肄業，記者到後，承他引導參觀，魯文街上極少車輛，清靜安逸，與布魯

塞爾迥異。著名建築有五百年歷史的市政廳，宏麗的教堂，及大規模的圖書館等。當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該城被德軍佔據，有意放火焚燒，連燒三天，燒毀了一千多屋子，存有十五萬卷以上著名的圖書館也遭了這個浩劫，大戰結束後，屋子已大多數重建，圖書館也重建了（大半出於美國人的捐款）。在德軍侵佔比境時，比國當局只想到死抗暴敵，並未曾想到一面準備不抵抗，一面把這些寶藏搬到別處去，這大概因為他們深知國土一塊一塊地被暴敵佔去，國且不國，搬移寶藏何用！況且他們沒有不平等條約的妙用，沒有什麼租界可供移藏寶物，這也是比不上我們的！

比利時雖小，最有名的報紙，也有八九種之多，以晚報（Le Soir）為最盛，印刷精美，插圖尤佳，聽說銷數每日近百萬。該報雖號稱『晚報』，每日出版四次，每次遇有最新要聞，即加以補充，第一次約在下午三點半，第二次下午六點半，第三次夜裏九點半，第四次半夜，便須在第二晨售賣了，故實際已包辦了全

日的新聞。至於各報對中國的態度，也學着帝國主義的大國的模樣，尤其是學着英法報紙的常態，那就是不登中國的消息則已，一登總是丟臉的消息居多！不過仔細想來，這也不能盡怪別人，因為我們自己，尤其是負政治上責任的人，先要問一問我們自己是不是要臉，先要問一問我們自己幹了什麼不致丟臉的事情！

最後請談談在比的中國人。在比國的中國學生約有二百餘人，在恩特瓦柏（Antwerp）當水手的有百餘人，青田小販來來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不久以前有駐西班牙的某比領受賄濫給護照，我國的青田小販因納賄而溜入比境者不少，後來這個領事的舞弊情形被比政府發現，革職查辦，青田小販被連累的都被逐出境。在這些腦子簡單的青田小販們，認為花了錢得到了護照，有什麼錯處，故常到中國使館請辦交涉，而中國使館則以此事在比政府認為違法行爲，無法可想，在法律上收賄者固被認為有罪，納賄者也不是堂皇的事情，弄得很僵，況且做的是中國人，除準備着被驅出境的分兒外，更有什麼話可說？

講到在比的中國青田小販，去年八九月間却發生了一件趣事。有三個青田小販同住在一個比國人的家裏，那家房東有三個女兒，正好配上了這三位青田小販，都發生了關係，其中有一個女兒年齡還在十六歲以下，於是她們的父親在法院提出訴訟，控告他們。但是房東太太以她的這個丈夫在外面有了一個姘頭，平日不但不住在家裏，而且置經濟於不顧，還是這三位青田仁兄常常接濟她的家用，所以到開庭審判的那一天，這位非正式的丈母娘在法庭上大幫這三個青田小販——那天觀審的很多，中國使館也派有人去旁聽，那位房東太太當着大眾，對法官口若懸河地大講她的一大篇大道理！她歷數丈夫種種不顧家庭的罪狀，極力讚揚這三個中國人如何如何的好！法官問問那三個女兒，也都說母親的話不錯，並且都表示願嫁給這三個中國人。結果那個父親大吃癩，那三位禍中得福喜出望外的青田仁兄各擁着嬌妻，凱旋而同！這個案件，比國的報上隻字不登，因為如把那位「丈母娘」的「中比人的優劣論」那一篇大文章發表出來，在他們當然認為

是和比國人的體面有關係的。

還有一件事，在布魯塞爾的大規模的理髮店裏，請了兩位中國的扦脚專家！我們中國洗澡堂裏的扦脚情形，想讀者諸君都知道的。這兩位扦脚專家因為來修脚的多屬舞女，享盡豔福，每月各有三五千佛郎的收入，一位娶了法女為妻，一位娶了比女為妻。中國人在歐的著名的職業，一為洗衣，一為燒菜（開飯館），現在大概要加上了扦脚！在巴黎時，有的法國朋友說，你們中國人的菜當然好吃，因為你們有了五千年的文明，燒菜的研究也有了五千年的歷史了！現在出了扦脚專家，不知和五千年的文明有什麼關係沒有！

比國人對中國的態度，講到政治的方面，比國外交向來是親法的，惟法馬首是瞻，法在外交上對中國的態度既不佳，比也可想而知，例如中日事件發生後，比政府的態度即偏袒日本。講到一般民衆方面，可以說大多數對中國完全莫名其妙，大概看到青田小販，便認為是中國人的代表，對於中國女子的印象，每以為

仍是小脚，穿着他們在博物館裏所見的那種小脚鞋。（寄寒的夫人生得娟秀，在比外交界便很出風頭，報上把她的相片登出來，即每有出門，街上行人都要特別注意她，也可以說稍稍替中國女子爭得一點面子，至少使他們知道中國的女子和他們殖民地博物館裏所陳列的剛果女子究竟不同！）不過他們裏面有一部分人因為本國無所不小，而覺得中國則那麼大得嚇人：講面積，一來就是四五百萬方英里，（比國面積只一萬餘方英里；）講人口，一來就是四五萬萬人（比國人口只八百萬人！）但是中國那麼大，人又那麼多，而却又那麼無用——至少在現狀之下——大概他們不免更覺得詫異罷！

一九三四，五，一四，倫敦。

五五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記者自英倫起程以來，天天遇着的都是晴朗的氣候，而三月廿六日那天却是在大雨滂沱中，靜悄悄地一人離開了北京布魯塞爾，乘着十二點五十分的火車，往荷京海牙進發。當天下午三點三刻到海牙，到的時候却太陽當空，晴光四射，我因在荷蘭沒有什麼熟友，便提着兩個小衣箱，叫一輛汽車直駛中國使館，一坐入汽車，第一印象便是整潔，向汽車的玻璃窗外面看看，第一印象也是整潔。那輛汽車是街上零租的野鷄汽車，但是汽車外面却油漆一新，措擦得乾乾淨淨，裏面的絨墊以及車旁的絨墊，都是很新很清潔的，這種汽車，在上海只能在私人自備的汽車中看得見的；再望望前面坐着的汽車夫，穿着黑呢的剪裁合身的制服，戴着黑呢的軍帽，頭髮和鬍子都修得很整齊，儼然好像是個軍官似的。我最初以為我也許是碰巧乘着這樣的汽車，但望望街上別部汽車，都相似。街道上處處給人以整潔的印象，路旁的花草整齊而美，房屋的窗飾整齊而美，馬路上和兩旁行人道的清潔，簡直好像用刷子刷洗過的。乃至來來往往的男女老幼，也個個整

潔。在我所經過的幾個國家裏，在整潔上能和荷京相比的，似乎只有瑞士。我入了這兩國的國境，精神便爲之一爽，眼光便爲之一亮，這種整潔的印象，是在別處所未曾得到的，雖則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等處的市政都辦得很好。（意大利比較地最髒。）

我國現在駐荷的公使是金問泗君，從前李頓調查團到上海時，顧維鈞氏曾在滄洲飯店開茶話會，招待各報主筆，記者忝陪末座，曾和金君晤面，但未有談話機會，這次在海外晤敘，覺他毫無官僚習氣，好像在學校裏遇着的一位同學，一見如故。他一嘴的松江口音，尤奇的是他的聲音語調乃至笑聲，和老友平海瀾先生（前英文雜誌主筆）沒有絲毫的不同；倘若我在隔壁聽他說話，一定要以爲平海瀾怎麼忽然到了荷蘭來了！我和這位變相的「平海瀾」暢談了許久，又承他介紹他的荷籍秘書談了一會，大都是關於荷蘭的情形，當晚即在使館吃晚飯。這夜住在使館附近的一個旅館，布置的整潔講究，除我在瑞士沮利克湖旁旅館所見

的以外，也是在別處所未見的。但是旅客寥寥。Hotel des Indes 也只在瑞士湖旁旅館裏所見的一樣。聽說有個旅館（亦在海牙）名 Hotel des Indes，房間比較地昂貴，最廉的每天要在七個半荷幣 Florin（每個約合華幣二圓）以上，就是要在十五圓華幣以上，竟完全沒有人住，個個房間空着，這樣下去，恐非關門大吉不可，這也可作為經濟上的一種寒暑表。

第二天早晨，我獨自一人依着指南，到荷蘭最著名的海濱希文寧根（Scheveningen）去跑了半天，所得的印象也是無處不整潔。該處即在北海（North Sea）之濱，由海牙去有電車可乘，十分鐘即達。這海濱是個歐洲著名的浴場，備備周全，空氣清新，廣闊的沙灘沿着海邊差不多近兩英里，有大規模鋼鐵架撐着的廣闊的橋似的建築，由岸上伸入海面四百五十碼之遠，（在英文稱 Pier，）伸入海面的那一端有很講究的餐館。在這 Pier 上，可依欄靜觀怒潮如山崩似的一陣一陣地向岸旁洶湧奔馳而來，使人有海闊天空駕潮浮游之想。沙灘後面有廣闊平滑的

柏油馬路，馬路的另一邊便是許多布置精美的旅館，菜館，咖啡館等建築，其中最宏偉精美的著名旅館稱 Kurhaus，樓上周圍的露台有三四十尺闊，有一千七百尺長。該旅館的大廳可容三千客人，聽說最熱鬧的時季是在六月至九月之間，我到的時候，不是熱鬧的時季，所以各處都是冷清清的，看不見幾個人影兒。我想這既是特殊權利階級享樂的所在，此後是這個階級逐漸倒臺的時代，在未○法○子○使這種地方開放給大衆以前，就是時季到了，要像以前那樣熱鬧，可能性大概要漸漸地小了。

依指南說，這浴場的附近有舊的漁村，在這裏面還看得見荷蘭舊式的奇異建築和奇異的男女裝束，但是我在附近跑了不少地方，跑得一身大汗，還尋不到，後來詢問路人，才知道這些地方也『摩登化』了。忽忽遶回海牙，在一個菜館裏胡亂地吃些東西當午餐，在下午又依着指南看了幾處名勝，其中最爲我們所久聞大名的當然是梅牙國際法庭，在所謂和平宮 (Palace of Peace) 裏面，該宮建築很

宏麗，由美國大資本家鋼鐵大王加納奇（Andrew Carnegie）捐助三十萬金鎊而建的。（等於華幣四五百萬圓了。）這個和平宮在表面上的目的是要藉仲裁辦法來獲得國際和平的，可是自受世界大戰的大打擊以來，所幹的事，只不過遇有各國商人有關於自己利益的事件，各國政府偏袒自己商人而爭吵不得解決時，才請這個「和平宮」裏的國際法官費着不少唇舌來「仲裁」一下。那樣冠冕堂皇而宏麗的所謂「和平宮」，現在所幹的「國際和平」大事業，實際僅此而已！

荷蘭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海牙便是這位女皇的常駐地。她現年五十四歲了，是荷皇威廉第三的女兒，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在他死後十歲時就承繼了皇位，先由她的母親攝政，到十八歲時即實際執政。她的名字全寫出來，有廿八個字母之多，總算是個少見的長名字。（原文為Wilhelmina Helena Pauline Maria）尤有趣的是做了女皇，為避免政權被奪或被丈夫干政起見，不得不選一個「飯桶」做丈夫；而且做了女皇的丈夫，吃飽飯沒事做，非「飯桶」

亦不能勝任！這位女皇登極後，於廿一歲結婚，對手是出身德國皇族，因娶了——毋甯說是嫁了——女皇，得到一個荷蘭親王（Prince）的頭銜，其職務除以異性資格服務於女皇外，便是吃飽飯沒事做，遇有公開宴會或盛會（Public Occasion），總是女皇在前，他跟在後面，各國外交官在交際場中覲見時，總是女皇先拉手，其次才輪到這位「飯桶」丈夫，總之無論何事，他只有跟在她的屁股後面的資格！中國話有所謂「雄媳婦」，有所謂「雌伏」，這個「飯桶」實可稱為「雄妻」，或可說是「雄伏」！

這位「雄妻」「嫁」了八年之後，才替他的「雌夫」「製造」出了一個「小雌」，這就是現在荷女皇的獨一無二的女兒，稱珠麗恩娜公主（Princess Juliana）現在芳齡已廿五歲了，看去荷國下代的統治者——倘若世襲君主制度還存在的話——還是一個女性。這位公主的「飯桶」丈夫，尚在物色中，而且聽說非登極後不能「大婚」，簡直是守着「活寡」，這也是做女皇預備者「說不出」的一樁苦

事——並且要物色這種『飯桶』，一天一天地難起來，因為除能做十足的『飯桶』外，還有個重要條件，便是須出身皇族的什麼親王，但是時代變了，這類『貨物』——親王——漸漸地少起來了，所以物色更不容易。荷蘭雖採立憲君主制度，但荷女皇的政權很大，和英王之徒擁虛名，政權全由內閣負責者又不同。荷蘭政府的立法權由女皇和國會連帶負責（國會稱 States-General，分上下兩議院，上議院的議員是由最富的公民中選出來的。）行政權則絕對歸女皇，在女皇之下雖有一個『參政院』（“Roud von State”，英譯為“State Council”），遇有關於立法及大部分的行政問題，女皇即開會諮詢，但全體參政員（共十四人）均由女皇委任，而該院主席（President）又由女皇擔任，實際僅屬諮詢（Consultation）性質，實權仍操於女皇之手。因此荷蘭最怕女皇的丈夫有野心，由夫權而擅行君權，於是『飯桶』丈夫竟為此種政制中不得不『利用』的『廢物』！

荷蘭的政黨情形，和比利時的大同小異，也是教會黨（尤其是天主教，稱羅

馬天主教黨 (Roman Catholic Party) 和守舊黨 (當然是資產階級的) 聯合的勢力。國會裏雖也有自由黨和共產黨，但是人數極少，沒有實力。尤妙的是守舊黨中有個政黨就老實自稱『反革命黨』 (Anti-revolutionary Party) 這也倒是老老實實的，比自稱革命，而實際是反革命，反以『反革命』罵人的，似乎總較勝一籌罷！荷國現內閣總理（其權甚微，不過做做主席，）和內政部長便屬於所謂『反革命黨』。司法，國防，和經濟勞動部長，這三閣員都屬於羅馬天主教黨。這也可稱為『反革命』和宗教的聯合戰線！

荷蘭是個偏於農業的國家，他們的重要農產品，除牲畜外，尤以乾牛酪，牛油，和雞蛋等為最著。工業的發展，比較地落後；缺乏充分的煤量，是此中一種困難的原因。但是在三百萬有業的人民中，已有一百萬人從事工業的工作，他們的工業規模也就不小了。（以紡織業為最重要，大部分輸出。）據最近的統計，一九三二年該國失業工人達廿五萬三千；一九三三年，竟增至三十四萬兩千。

人，劇增的比例數頗可驚：(Amsterdam有鑽金銅鑽工人五千人，失業者四千。)荷蘭殖民地比本國也大得多，本國面積只有一萬兩千餘英方里，而殖民地的面積却有一百五十餘萬英方里；本國的人口只有八百萬左右，而殖民地的土著人口却有九千四百餘萬人。平均約計，每一個荷人，至少有十個殖民地的人民供奉他！但是殖民地的血究竟也有乾涸的時候，所以還免不了掉什麼工人失業劇增的問題。

講到荷蘭的本國面積，有一點頗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伸有縮（牠的縮，並不像我國那樣寬洪大量地容許日帝國主義者今天佔一塊，明天佔一塊，嘴裏還嚷着什麼「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是被海所侵入，而荷人且能和海抵抗，建造大規模的海堤，像該國最西部的一省名海地(Zeeland)便是用三百英方里的海堤保住的。中國年年鬧水災，荷國國土大部分都在海平線八尺以下，却能用精善的堤，不但保護着土地，而且使土地因此更腴潤宜於農業，這也在乎努力不努力的區分！不僅此也，中國有「精衛填海」之語，荷人一向就在那裏幹。

「填海」的把戲！在中世紀的時候，屢次被海侵入，其中有一次竟把一大塊陸地造成現在荷國北方的南海 (Zuider Zee)，把荷蘭國土大縮一下！自十六世紀以來，荷人和海爭地，填得的土地已在百萬畝 (Acre) 以上，在一九一八年，國會通過一個空前的——在全世界上空前的——填海議案，要在南海中填出一省的土地，預定面積五十餘萬畝，經費七萬五千萬金圓，需時三十三年，已於一九二四年開工，現在已填了一部分。荷蘭本國面積不過一萬兩千餘英方里，居然分成一省，現在又要和海爭得一省！他們覺得土地的獲得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聽到中國的東北有德法兩國合起來那樣大，竟於幾天內拱手奉讓給日本，真替我們中國『肉麻』，在表面上代我們歎惜不置（據我國駐荷公使金君談及，他就遇着不少這樣代我們歎惜的荷國友人和政府當局中人），心裏也許不免還要暗暗地驚異中國何以竟是這樣一個大飯桶！

五六 荷蘭的商業首都

海牙是荷蘭的政治的首都，安斯特丹姆（Amsterdam）可算是荷蘭的商業的首都。記者於三月廿七日晚間十點鐘和荷蘭的政治首都告別，當夜十一點鐘由火車到了荷蘭的商業首都。在這天夜裏未動身前，又承金問泗公使堅約吃晚飯，在座的有王寵惠君（現在海牙國際法庭任法官），馮執正君（安斯特丹姆中國領事，適因事在海牙），金夫人和馮夫人等。王君談興甚濃，說中國簡直不知是什麼東西。說她是國家，她不像；說她是亡了國，也還不是，假使他是上帝，在天上望下來，看見這樣好的一塊好土地被中國人弄得這樣糟，講句公道話，也不能原恕的。他又說歐美的政治家，一旦被議會彈劾，叫他滾蛋，他明天拿起皮包就滾；

中國則不然，在政治上負重要責任的人，把國事弄得糟到不堪，你要趕他走，他還是要賴着不走！這夜記者因聽見馮君也要回安斯特丹姆，本想約他同行，後來他因臨時有事要延到第二天動身，於是記者一人先走。

在海牙臨走時，承馮君介紹一個價格比較便宜的旅館，我到安斯特丹姆後，即乘車直到該旅館居住。該旅館有房間十九個，只有四個房間有人住，我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時，順便和該旅館的老闆談談，他搖頭大歎生意不好，並說規模更大的旅館更不得了。

在荷蘭的海牙和安斯特丹姆的街道上所見的，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腳踏車之多。腳踏車（即 *Bicycle*）原是一件很尋常的東西，但是有趣的，不但滿街都是，好像螞蟻成羣結隊亂竄着似的，而且乘坐的人之熟極生巧，運用如意，那兩隻車輪簡直好像是生在身上的兩條腿那樣靈便！青年男女並排同乘蜜語，速率緩速如意，還要挽着臂，其靈便不在意，和步行毫無差異，有時三四人乃至四五人並排

乘着大談其話，風馳電掣而過，如在冷靜的街道，原不足異，特別的是在很熱鬧的市街上，在許多汽車電車的夾縫中鑽來鑽去。在這些地方，在電車上所見的盡是老頭兒老太婆，差不多看不見青年男女，要看看青年男女，只有在腳踏車上。那些健美的少女，挺着胸部，穩定着腰部，前後左右進退如意地坐在腳踏車上來往往，煞是好看。怪有趣的是中年以上發胖得不知所云的婦女，還有很不自量乘着腳踏車在街上湊熱鬧的，看那個三四尺闊的臀部放在幾寸闊的車上的坐位上面，好像一柱支撐着大廈，實在就難爲了她！他們的腳踏車很普及，七八歲的小孩子就會乘，聽說閩員的太太們乘腳踏車在街上來往，是件常事，安斯特丹姆的人口共約七十餘萬，而腳踏車的數量就有五十萬輛。

荷蘭女子的舊式裝飾很特別（參看銅圖），舊式的房屋也頗有趣，這都只能在僅存的漁村中才看得見。安斯特丹姆附近有兩個地方看得見，一個名馬壑（Marken），一個名和倫丹姆（Volendam），都是十三世紀傳下來的漁村生活。

兩處情形差不多，我爲省時起見，只選看了一處，便是和倫丹姆。三月一日下午偕馮君夫婦和徐家驥君同往，同乘馮君的汽車，一點多鐘才到，途中我們的汽車有一大段經過田旁一條馬路，雖在鄉村，整潔一如城市，馬路的一邊是一望無際的碧綠的田野，一邊是長滿着青草的高十幾尺的土墩，馮君在車裏告訴我，這也是一種海堤，堤的外面便是南海，我們走過的這條田旁馬路，便在海平線七八尺以下，我們好像是在海的下面溜過去！這種工程很足以表示人力和自然鬥爭的勝利。到了漁村之後，所見的確另是一番現象。街道雖也是馬路，却比較地狹窄，兩旁房屋都是用木板建成的一層的小屋子，每所屋子二三個房間，也有玻璃窗，布置得也很清潔，牀鋪裝在牆上，好像壁櫥似的，有矮梯靠在牀前，以便爬上去。馮夫人引導我們到一個她屢次到過已成相熟的漁婦家裏，仔細地參觀一下。這漁婦當然也是穿着特別的古裝，已經七十五歲了，她的丈夫二十五年前出去捕魚，一去而不復返，留下她孑然一身。她沒有子女，靠洗帽爲生，房間裏仍依

習慣整理得很清潔，指着牆上掛的她的丈夫的相片，還娓娓告訴我們關於她的丈夫的種種。馮夫人說有的時候這老太婆便說便揩眼淚！我聽了很覺難過，「生別已吞聲，死別長惻惻，」這真是人生無法避免的遺憾。

這種特別的裝飾——廣大而長的裙子，尖而且蹺的木鞋，五花八門的頭飾——衣服多是用花花綠綠的衣料製成的，尤特別的是四五歲的女孩兒所穿的衣飾，和他的老祖母的形式一樣；那天我們在這個漁村的街道上看見兩個四五歲模樣的女孩子攜着手走，兩人所穿的都是和老太婆同樣的形式，其中有一個大概因眼光不好，還帶上一副有邊的（似乎是白銅的）眼鏡，遠望去更像小人國裏走來的一個小老太婆。我們都望而失笑。不過所見的不少青年女子，雖穿上這樣的古服，却也能表現着她們的青春的健美態度。該處男子的服裝也和尋常的不同，穿着很大的褲子，戴着奇特的帽子，但還不及婦女的特別。這天還是尋常的日子，每遇着星期日或節日，大家穿着新衣出來，那更特別地好看。

荷蘭以殖民地廣大聞於世，所以我也去看看他們在『商業首都』所建立的殖民地博物館，和比利時的規模差不多，其實他們的重要用意也不外乎兩點，卽（一）物產豐富，大有剝削榨取的價值；（二）土人文化種種落後，大有該被剝削榨取的理由！

在安斯特丹姆所聽得最難過的一件事，便是『拚大』和中國人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拚大』是荷語“Pinda”的譯音，譯意是『花生糖』，花生糖何以會和中國人發生了密切關係？發生了關係，何以會使中國人聽了覺得難過？說來話長，請諸君耐着性兒，讓我略加說明。在荷蘭的華僑約近三千人，其中有粵人，有青田人，以青田小販爲最多。青田小販在歐洲各國替中國留下很惡劣的印象，我到歐洲後時常聽到，在以前通訊裏也略曾提及，前年（一九三二）在荷的青田小販裏面有人因生計無路可走，忽想出一種新花樣，卽勉強買些花生和糖，燒成一小塊一小塊的花生糖，用一隻洋鐵小箱裝着，掛在胸前出去兜售。這原是做生

意，不算是什麼丟臉的事情。荷人做小販的未嘗沒有，但是荷人做小販的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裝飾很整潔，而青田小販却衣服襤褸，窮相畢露，其中抽雅片的更是涕淚滂沱，面有菜色，荷人看見以爲他是饑餓了多少時候的結果！有的便多給幾個錢，有的甚至給一圓二圓的，最初每天僥倖得二十圓的，不算希罕，平均每月有三百至六百圓的進款。這樣一來，青田小販們認爲這真是好生意，於是無業的固然大賣其花生糖，有業的也改業去賣花生糖，在最短時期內便如雨後春筍似的，胸前挂着小洋鐵箱滿街兜售花生糖的青田小販竟達八九百人之多！這還不打緊，最尷尬的是他們都因爲最初可以能引人哀憐而多給錢的，是由於那副窮相逼人，於是都用種種方法表現窮相，衣服固然要穿得特別的破爛污濁，在冬季就穿着單衣發抖，並有意把臉上弄髒，拖着鼻涕裝死相！最初僅發現於洛特丹姆（Rotterdam，亦荷蘭大商埠之一），漸則遍及於海牙及安斯特丹姆。凡是在熱鬧場所，各大旅館，大菜館，以及各熱鬧街市，都隨處可以看見在荷人認爲中國

人的唯一代表的賣花生糖的青田小販！他們往往到各人家去打門強賣，中國領事館常接到人家主婦的電話，說在做早餐時有賣花生糖的中國人來打門，午餐時又有，下午午睡時又有，做晚餐時又有，開了門便要強賣，嗚嗚不休，她氣極了，很憤怒地叫中國領事館以後不要再叫中國人去！他們不但在城市裏，因人數多了，並分散到各村莊裏去打擾。荷蘭地方並不大，於是『拚大』在荷國竟很普遍地成了中國人的代名詞！這個名詞的含義不但是賣着花生糖而已，同時連帶引起的印象是骯髒的身體，滿面的煙容，嘔人的鼻涕，強賣的麻煩等等，總之在他們（荷人）是認爲代表一個十足討厭的中國人！還有荷人把『拚大』爲題，編成一首跳舞的歌，據說因音調非常的和諧好聽，於是傳播非常地普遍，各跳舞場固然都常常彈唱着，即一般人以及兒童等等，會唱的也很多。這歌的開首是『勒咯！勒咯！』（“Lecker! Lecker!”），譯意是『好吃！好吃！』於是街上孩童每看見中國人，除對你叫『拚大』以取笑之外，有時也裝腔作勢唱着『勒咯！勒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田小販之類的人物）二百人左右，到德國去參加表演。荷報更多方擲榆，在廣告上大書而特書，說「拚大」一變而為電影明星了！於是為好奇心所激動而去看的更多！此事在德國原已由中國學生會出來交涉，阻止開演，（在柏林亦開演）但中國人有誰理？烏發公司還是悍然不顧地開演着，並且運到歐洲各國去開演，哀哉中國人！任人摧殘糟塌而已！

我還在安斯特丹姆的二月廿八的那天，正是該地法庭開審中國人假幣案的事件，有中國水手身藏假造的荷幣（五圓一塊的銀圓）不少，拿到賭場去賭博，輸則出偽幣，贏則只要鈔票，遂被發覺，搜出身上偽幣被拘，開審的那一天，看的人很多，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德國漢堡同時也發覺中國人偷運大宗偽造的馬克。聽說這類偽幣是素講「王道」的某國浪人在上海秘密造成的，不過由我國海外的窮僑民代為偷運推廣，得些餘瀝而已，但中國的名譽又多受一度的『洗禮』了！

五七 一個從未和中國人談話過的德國女子

記者於三月二日上午十點廿七分鐘離開荷蘭的商業首都安斯特丹姆，當夜九點三刻到柏林。

一連坐着十一小時左右的火車，這在歐洲旅行中算是比較地長久的旅程了。一個車廂裏的座位可容八個人，進門分左右座，每旁四人，門的對方是個窗口，窗下有可升降的小桌子兩個，這是歐洲各國火車大同小異的布置。這天我所乘的這個車廂，最初只有我一個人，坐在近窗的一個位置，後來陸續進來了三四個，都是男子，不久車過洛特丹姆時，有個女子上車進來，坐在和我的座位適成對角的近門的那個座位上。這女子很有健康美，兩個晶瑩的藍眼睛，兩頰桃紅色的白

潤面孔，一頭蓬鬆的黃金髮，都頗動人，就是稍稍肥胖了一些。我和其他幾個男子都在看書，獨有這個女子眼珠滾轉着東張西望，瞧這個，瞧那個，但全車廂裏都沒有談話，靜寂沈默籠罩着全部的空間。到下午三點鐘左右，其他男子都逐漸下車去了，所餘下的只是坐在車廂裏兩對角的我和那個青年女子。我看書也看得倦了，便把書放下，向窗外縱覽車外的野景，不一會兒，那個女子移到我對面的那個也近窗口的座位坐下。旅行的人最喜歡和各地人民有談話的機會，我看她的態度很個儻，便問她懂不懂英語，她歉然笑着說懂，於是才開始談話。原來德國的中學和法國一樣，除讀本國文外，在法還要學習英德兩國的語言文字，在德要還學習英法兩國的語言文字。他們學習這兩種外國語的重要目的都偏於養成閱看書報及翻譯的能力，對於會話不見得都很高明，但因此一般中學畢業過的男女都大概能說幾句。我所遇着的這個德籍女子，後來由談話裏知道她是中學畢業過的，所以除她的本國語外，法語和英語都能說幾句，在她的意思，她的英語比法

語好，我聽起來雖覺得還有不少牽強處，但至少是可以傳達她的心意了。她說從來未曾和中國人晤談過，初看見我的時候，以爲我是日本人。我們兩人把彼此的話匣開放了之後，一談就談了幾點鐘，她的談天的勁兒，比我還要好。我們先談些荷蘭的景物，後來她把身世以及個人的婚事等等，都和盤托出地，全都告訴了我。德國女子的坦白豪爽，確爲他國女子所不及，雖則她在談話若干時間後，對我表示特別的好感和信任，她說從來未曾和中國人晤談過，不料一接談即覺中國人是好朋友。

這個德女年齡廿五歲了，父早死，母再嫁，她中學畢業已八年了，這八年來就在柏林一個化妝品公司裏任事，已升到一部的主任，常被公司派到國外去開展覽會，替公司推銷貨品，最近是被公司派到荷蘭洛特丹姆去幹這同樣的職務，才結束迴柏林的。聽她所談，對於她公司的事務布置得有條不紊，看去她似乎是一個很有幹材的女子，她說她已定婚了，未婚夫的年齡比她大得多，三十八歲

了，我乘這機會說：『那你年青多了！』這句話探出她自己的年齡，說是廿五歲。（西俗對初交女子不應直問年齡的。）她也乘這機會問我的年齡，我說『你猜猜看！』她仔細對我相了一下，說大概廿六歲。她自以為猜得很準，不待我承認或是否認，便又很柔婉地談說她自己的事實，我只凝眸微笑着靜聽她的話語。

這位E女士定婚已四年了，她的未婚夫S君原是一個無線電公司的經理，每月有五百馬克經常的收入，自備了一輛汽車，在四年前她的母親帶着她和幾個女友在某跳舞場的時候，（這種跳舞場裏的女子都有母親陪伴着，算是正當交際的一種地方，和『狂蜂浪蝶』的跳舞場又不同。）桌子都沒有空的了，S君剛巧也和一個朋友同到這裏來，因她的桌旁還空着兩個位置，便得到她母親的許可，加入共談。S君對E女士一見傾心，第二天就到她家裏來。（當時也就是在她的母親的家裏）訪她，第三天就提議定婚。她說婚事那有這樣快，不許，後來做了兩個月的朋友，她的母親和後父都極力慫恿，便定了婚。不料S君在定婚之後，正

是世界經濟恐慌的狂潮開始的時候，各業大概都受着影響，他的公司也在這『狂潮』中倒閉了，他便失了業，一失業就失了四年，迄今雖千方百計，仍是不免失業，因此定了四年的婚，直到如今還未能結婚。她說不但她一個人遭此厄運，她有女同學九個都已定了婚，都因為她們的未婚夫陷入了失業的隊伍，大家都未能結婚。她的那個笑靨迎人的面部忽而裝作苦臉，說照現在的情形看去，恐怕十年八年無法恢復經濟的原狀。我說你們新結婚，只須實行節制生育，生活也可比較地簡單，結婚似乎也不妨實行。她說不然，依希特勒新頒的法律，男女結了婚，只許男子就業，女的便須做『家子婆』，（英文的 Housewife，用上海話的『家子婆』譯意，似很確切，）倘若她就結婚，S君既未能得到職業，她還須隨着失業，如何得了！這是經濟問題，我却無法代為解決了。

她說她近來對於自己的事情，愈想愈煩悶，因為她屢次被公司派到國外去推廣貨品，她的未婚夫很不高興，疑心她有別的男朋友在外國，常常和她吵嘴，最

近她在荷蘭寫了幾張風景明信片寄給他，一個復信都沒有。我說這是在職務上不得不做的事情，儘可解釋給他聽，她說因爲他疑心重，無論如何解釋，他都不能釋然。我說幸福的婚姻的最重要的條件是男女兩方均彼此真能愛，真覺得彼此可愛，你對他的愛怎樣？她說他愛她比她愛他多得多，時常怕她解約；他曾對她說，如果她要解約，他要用手鎗打她；而且她的父母也不贊成她解約；如她解約，他們便要和她斷絕關係。我聽了她這些話，知道她對於自己的婚事是很勉強的；她雖然在經濟上已全能自立，但仍受着社會環境的束縛，時時在矛盾的心理中感到無法解脫的苦痛。還有一點也很可以注意的，希特勒的國社黨的重要政策之一，是極力提倡人民多多結婚，多多生子，（這事以後還要較詳地說到，）而在實際却是反而減少了結婚，也減少了孩子的生產。

後來我們談到學習德文的事情，我說在歐洲旅行，只懂英語，隨處碰壁，很不舒服，所以我頗想在德的時候，分一些工夫出來學習一些德語。她聽了自告奮

勇，說她在晚間可騰出工夫教我。我說你有了那樣多疑的未婚夫，此事不很妥當罷。她說不要緊，我說倘你能實踐兩個條件，我可到你那裏學些德語。她很焦急似地問什麼，我說第一須徵求S君同意，倘若他覺得有一些勉強，即作罷論；第二是每次教我的時候，最好須請她的未婚夫也來陪伴着。關於第二點，我說並不是我們自己不信任自己，實因為多疑的人往往無理可講，我不願增加他們的糾紛，所以要這樣做。她都答應了。火車進柏林第一個車站時，她移過來和我並排坐，時時握着我的手，叮囑我到柏林後一定要去找她。我說我要來探問你的未婚夫許不許你教我德文，一定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得到女性這樣熱烈殷厚的友誼，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驗。我們兩人在車裏那樣暢談了大半天，別個車廂的外國客人偶而走過我們車廂門口的時候，都很加以特別的注意，尤其是有兩三個女旅客，E女士笑着對我說，他們以為我們是夫婦哩，所以那樣注意。她說後頗有洋洋得意之色，我心裏暗笑，這有什麼得意！不過看她那樣坦白豪爽，絲毫不避

什麼嫌疑的天真態度，却感到濃厚的興趣。

車到了 Charlottenburg 一站，我先下車，她還要再下一站才下車。她聽說我有位朋友張博士（張述祖君）要來站上接我，她也要看看她所遇的第二個中國人！所以我下車後，匆忙間還把張博士介紹給立在火車窗口內的她。走後張君說這女子生得很美，可惜稍稍胖了一些。我笑着說，我得的印象和你的一樣。

記述遊德的印象，劈頭就寫了許多關於一個德女的事情，這不是記者特別重視這件小事，一則不過爲記述順序之便，二則因爲從這小女子的口角裏，無意中可看出德國民間一部分的實際情形。我到柏林的第三天，便去找她，相距很遠，乘『環城電車』差不多乘完一個半圈兒，（如把『環城電車』看作一個大圓圈）僅僅車上費了一小時。到後E女士就把S君介紹給我，她也懂些法語英語，但英語的程度很差。我知道她已允許E女士教我德文了。我和她講好每星期一三五夜裏來一次，每次從八點到十點。路上來往要費去兩點鐘，所以我每次下午七點鐘

以前就要動身，在最初兩星期，往往在『環城電車』上換車時換錯了車，大兜其冤枉的圈子，到得很遲，回到寓所時，常在夜裏十二點鐘以後了。

柏林的一般房屋和倫敦的不同，倫敦的住宅多是一家獨住的比較小的房屋，柏林的住宅多是像大公寓的式子，在一大座浮房內，住許多人家，大門內傍着樓梯上去，各層的屋子都住有幾個人家，各家都另有一個小門出入；在每一個這樣的小門內，有一個甬道，甬道兩旁有幾個房間，有廚房，有浴室和廁所，甬道和房間裏都舖有絨地毯，浴室裏用的是白色的浴盆，廁所裏用的是抽水馬桶（浴室和廁所常在一間裏）。廚房裏用的是煤氣灶，布置得都很整潔。E女士的父母在漢堡，她在柏林就業，已自己撐了一個獨立的門戶，租賃了這樣一個公寓裏四層樓上的一個獨立的屋子，裏面有一間臥室，一間客堂兼膳室，一個廚房，一個浴室兼廁所，裏面的布置也和其他一般人家的一樣的講究，在我看去可算是很舒服的了。這屋子是她一個人獨立開銷的，S君算是措她的油，他們雖沒有明對我

說他們已同居，但我每次深晚離開時，S君還在那裏；遇星期日他們約我往吃午飯，在上午十點多鐘時，還看見S君在浴室裏穿着襯衫向着鏡子大刮其鬚子，所以我斷定他們是已同居的了。

這和已結婚似乎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他們倆都不滿意，都很着急似的。男的因為要急於結婚，而結婚的先決條件是要先得到職業，於是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無孔不入的尋找職業，我每次去，差不多都看見他在那裏翻着報紙找公司名稱，寫自薦信，因為在資本主義已發達的社會裏，像在封建勢力還有殘餘的社會裏，找事要靠親戚朋友或裙帶關係的，已不同了。但在那裏一個多月，只看見他忙於寫自薦信，却沒有看見或聽見他曾有一次把自己薦了出去！我最初幾次還問問他成功了沒有，聽說還沒有效果，還安慰他幾句，後來看見他儘是老寫着自薦信，我不好意思再問他，也找不出什麼話再來安慰他了，只得假癡假呆地裝作不知道。E女士每談起S君尋業的事，總不免長吁短歎，蛾眉雙鎖，德國人失業。

的。尷。尬。和。緊。張。的。情。形。看。看。這。一。對。男。女。天。天。好。像。負。着。重。擔。似。的。可。見。一。斑。了。

我每星期有三夜在E女士家裏讀德文時，S君也常在客室裏寫自薦信，有時練習書法，這原是我所要求的第二條件，在上面已說過，他在實際上既是和E女士同居了，此事却也很便當地辦到，在我也很欣幸地減少了不少的責任。但是說來可笑，這個多疑的未婚夫仍然不放心。在兩星期以後，有一夜他出去十分鐘去買香烟，（他香烟癮極大，一天吸到晚，簡直非此過活不去，不然，我想他連十分鐘也不願離開！）E女士偷告訴我，說S在廚房和客室相隔的那個牆上——很講究的花紙糊得很好的牆上——偷挖了一個小洞；在我們（指我和E）上課的時候，他屢次托詞到廚房裏從這小洞裏偷看，看我們有什麼……最近她才發覺的。我聽了笑不可仰，我說還好我們都是正正經經的，倘若接了吻，那真要鬧得天翻地覆了，她聽了只有憨笑。又過了幾天，她又偷告訴我，說S君最近已暗中把那個小洞塞住了。我心裏暗想，大概他已經可以相信我實在是無意於掠奪他的未婚

妻了。

上面所說的柏林的公寓式的住宅，每晚到八點鐘以後，就由房東或看門的把總門鎖起來，各家出入都須自帶鑰匙，我每次在夜裏去，如八點鐘尚未趕到，總是由S君在門口等候着迎進去；出來時，也是由他從四層樓上跑下了不少的樓梯，把我送到大門口，因為出時要他用鑰匙開門，走後還要由他鎖門。最後一星期，有一夜他不知因日裏做了什麼吃力的事，已疲頓得不堪，我走時他覺得已沒有氣力跑那四層的長梯，便叫W女士送我下來。她自動地挽着我的臂，送我到大大門口時，笑着不肯就進去，對我望着，把她那櫻唇漸漸地接近我的唇邊，我看她那樣渴望着的殷切情緒，並知道在歐洲各國和要好的女友接吻不算一回事，便順從了她的渴求，給了她一吻。她笑瞇瞇地謝了我，回轉身好像凱旋似地向樓上如飛地跑去了。我一路失笑着回來，笑自己無意中演了電影中的一幕；同時並哀憐S君，因為她的心是否在我——我始終無意對她『轉念頭』，所以絕對不希望——

雖未能斷言，但她的心不在S君，却是無可諱的事實了，我覺得單戀而要勉強維持，在單戀者方面實在是一件極不值得而且極無聊的事情！

S君雖是個多疑的人，但待我却很好，每在我來讀德文的夜裏，他在忙着寫自薦信之餘，還忙着泡茶，拿糖餅，殷勤招待我；每在星期日他和E女士同樣地十分的殷勤約我同遊，到了不少他們的親戚和朋友的家裏吃茶點聚談，使我看到聽到不少關於他們各家的情形，使我最覺詫異的是有一次在E女士的一個女友家裏吃茶點閒談，E女士和她的女友都說她們深以我不像吃鴉片者的樣子爲可異！我問何以就覺得我必須吃鴉片？她們說，據她們所聽說，中國人都是吃鴉片的！經我駁說解釋之後，她們才恍然平日傳聞的錯誤。這在我們聽了當然不勝詫異，尤其是像這兩個女子都至少是高中畢業生，何以一無常識至此！但是想到歐美各國關於糟塌中國人的種種宣傳——小說，電影，報紙等等——一般人安得不把中國人「另眼看待」！記者追記這篇文字的時候，這幾天經過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

院附近的王路 (Kingway) 便看見有一個教堂前掛着一個很大的廣告，是素在口上主持「正義」的國聯協會 (League of Nations Union)。這是英人贊成國聯的一種組織，替國聯做的宣傳，這廣告上面用圖畫表示國聯的種種事業，別的好事都輪着碧眼兒，唯有禁止毒物鴉片的一項，圖裏的那個煙鬼却是個中國人的象徵！中國人抽大煙的大名，可謂已名震寰宇了！

我將離開柏林的前一夜，還到 E 女士和 S 君處辭行，E 女士很大膽地當着 S 君的面前不自禁地哭了許久，我倒着了慌，不知如何是好，我說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這樣反而使我不好過，她才勉強收淚。那夜承他們兩位直送我到「環城電車」的站上，（約有二十分鐘的步行，）殷勤握手道別。我因怕此事往後也許要引起意外的糾紛，這決不是我所願有的，所以臨走時聲明我在歐洲是在各國跑的，行踪無定，而且太忙，恐無暇通信，請他們原諒。

五入 所謂領袖政治

到柏林後，常聽到德國人互相見面打招呼時，不像法國人之叫“Bonjour”（日安），或英國人之叫“How do you do?”（你好？），却叫着“Heil Hitler!”（大概可譯爲「希特勒萬歲！」）這大概是捧領袖的意思，雖則有些德國朋友私下告訴我，說有許多是在威權壓迫之下，要保全自己的飯碗，不得不這樣叫一下，在實際上所叫的不是希特勒「萬歲」，是他們自己的飯碗「萬歲」！

此外在照相館玻璃窗內所陳列的，滿山滿谷的形形色式的希特勒的相片；在雕刻鋪子或銅鐵鑄像鋪子的玻璃窗裏所堆着排着的，也是大大小小無微不至的希特勒的造像，這大概也是捧領袖的意思。這類相片或是造像裏所表現着的希特



勒，當然都是威風凜凜，神氣活現的態度。他的政敵裏面有的竟敢惡作劇，不知怎樣弄到一張呆頭呆腦的照片，據說是希特勒一歲時候的真面目（見插圖），拿來各處廣發！還有人把他的相片另印一下，在頭髮上面加一個小小的列寧的相片，和髮紋稍稍混亂，使人粗看不知道，略一細視，才看得出，也拿來用祕密方法廣播全國，黨老爺們（國社黨）也許還很熱心地幫同推廣，以廣宣傳，後來發覺，極力禁止，却也『宣傳』得不少了！

講領袖政治的，大概都很提倡對於領袖的盲目的奴性的服從。（服從原也有好的方面，如服從真理，服從所信仰的主義，服從正當的規則及值得服從的人物等等，但和盲目的奴性的服從，在性質上當然有很大的差異。）像意大利由法西斯黨所辦的青年團團員正式加入做黨員的時候，必先宣誓『願無討論地』（Vivi-

thout discussion”)執行領袖(II Duce, 指墨索利尼)的一切命令……」我在德國時，也常常聽見這裏有幾萬公務員，或那裏有幾萬國社黨黨員，聚攏來舉行大規模的宣誓禮，最重要的一句話，是『絕對服從希特勒』

無論什麼性質的集團或機關，只須是有『羣』的形式，在職務上的需要，當然有領袖的必要；就是我們尋常組織一個旅行團，如人數較多，爲種種事務上的便利和需要計，我們也常要公推一個適於做團長的人，代表大家的公意和需要，主持一切，他的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能把這一團人所要解決的事情解決掉，倘無法解決而又裝腔做勢，儘管吹牛，誰來睬他！倘若這個團長僅勾結幾個壞蛋，爲少數人的私利，摧殘大多數團員的福利，用殘酷手段壓迫大多數團員，還要以『領袖』自居，認爲『領袖』是天生的，你們這般團員活該像奴隸似的受統治，這又成了什麼話呢？

現在德國各校所用的歷史教本，除由政府所承認的教本之外，還由政府所選

任的「歷史家」特著種種補充的讀物，最重要的是敘述希特勒的發難和他的「主義」，目的在造成「以愛國心，種族的意識，和領袖制為基礎的更偉大的德意志」(“Greater Germany founded on patriotism, racial consciousness and leadership.”)試舉其中有一冊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三三年德意志民族的復興」(“The Rise of the German Nation 1914—1933.”)就說「在德國最困苦的時候，在德國正臨着深淵的時候，上帝又在希特勒的身上，給德國人民一個偉大的領袖」。這和我國的無知鄉民相信「真命天子」的觀念有什麼分別？不過一方面是在中國鄉民中之無知者，一方面是出於素以科學發達聞於世的德國的「歷史家」罷了。(註：以上引證語見“Daily Herald,” May 10, 1934.)

現在這種領袖制，德國不但在政治上採用牠，並極力輸入全國其他的各種組織裏面去。例如德政府在一月間新頒的勞動法(Labor Law)，便把僱主認為「領袖」，把他的工人認為「服從者」。這些「服從者」依法雖也有組織所謂「信任

委員會』（“Confidential Council”，）但這個委員會的候選人却須由「領袖」——即僱主——會同國社黨的『工廠細胞組織』（“Factory Cell Organisation”，即國社黨所包辦的工會組織）的書記，共同圈定之後，再由職工選舉，組成所謂「信任委員會」，代表全體職工和「領袖」——僱主——「合作」。由僱主圈定的「信任委員」，當然是可以「信任」的了，不過此處的「領袖」却不是「上帝」所「給」的，乃是有資本做僱主的人們！他們的靠山是「上帝」所「給」的那個政治上的大領袖！

我以為爲這種政治上的領袖是否「上帝」所「給」的，倒不值怎樣的注意，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他能否解決全國大多數人所亟待解決的問題。德國的情形和中國的不同，但大題目也只有兩個：一個是對外問題，尤其是取消凡爾賽條約問題；一個是對內問題，尤其是救濟失業問題。我覺得「上帝」所「給」德國人民的『政治領袖』所幹出的『領袖政治』，對這兩個問題，似乎只有「口惠」，實

際。都。沒。有。辦。法。這層此刻暫且慢談，後面當有專篇作事實上的分析。

我此時要提出可以注意的幾點如左：

(一) 上面所述的那種方式的政治領袖，也決不是像天上憑空掉下來的一件東西。例如德國的希特勒，去年一月間所以得一躍而上政治舞台，實當時實際環境所湊成；德國自社會民主黨秉政以來，不主張澈底改革，只在現社會組織下努力，始終為資產階級利用，後來資產階級鑒於勞動階級的聲勢日大，深覺社會民主黨之不足再供利用，乃索性揭開假面具，利用國社黨，作明目張膽的壓迫，以作最後的掙扎。換句話說，這制度還須靠民族資本家做靠山，才能成立，殖民地化的國家，便無效法的可能。

(二) 這種所謂政治領袖，在未上台以前，要奪取政權，也要用欺騙方法，吸得一部分民衆的擁護；這種欺騙，所以能有相當的效力，是因爲他從前未在政治舞台上。有過惡印象留在民間的緣故。倘若早已久執政權，統治得一團糟，信用

掃地，要想再用欺騙方法，利用『領袖政治』的新招牌，那更是一件難事了。

(三) 在外國所見的這種所謂領袖政治，雖未見他們對國事有何根本的辦法，但他們個人方面，還能稍稍顧點面子，不得不做出一點勤廉的樣子，像希特勒最近聽說連薪水都不要，全部捐作黨費，這於社會根本問題的解決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並不值得怎樣的讚揚，但比之東一個別墅，西一所洋房，窮奢極欲的政治上的所謂『要人』，給人的印象究竟有些不同。

最後關於『領袖』這個東西，還有一點感想要附帶地說：我在柏林的時候，屢次聽見有中國友人看見德國有一班人大捧他們的領袖希特勒，便慨乎言之地說中國人就缺乏這種『美德』（？），說中國人就不肯擁護領袖，並肯定地斷言中國之沒有救藥，病根就在這裏。關於這一點，我却有些不同的感想，我覺得中國人最重視領袖——不過我們所重視的領袖是真能在行動上事實上表現他能為大眾犧牲努力的領袖，倘只叫中國人對着掛空招牌的領袖舉手行禮高呼「×××

萬歲！』這玩意兒是弄不來的。關於這一點，事實上的佐證多得很，隨手拈來都是。試舉一二比較近的事實說，在舉國民衆熱烈抗日高潮的時候，馬占山將軍在嫩江率軍血戰抗日，全國人民對於他的崇拜的種種表現，實難形容，杜重遠先生當時到四川重慶一帶去演講救國運動，甚至看見有人把他的相片排列在祖宗牌位一起，有人希望他有機會做中國的大總統！上海十九路軍血戰抗日，全國民衆對於他們的領袖及士兵們的崇拜，其種種表現，也是出於衷心而爲我們所共見的。我當然不是說這些人就可以做中國政治上的領袖，我是要證明中國人所需要的領袖是在行動上事實上有辦法爲大衆努力的領袖，不是掛着空招牌擺着空架子的領袖。如有人自以爲是中國的領袖而怪中國人民不知或不肯擁護他，我要請他問一問自己有了什麼，做了什麼，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的信仰和敬重！

五九 褐色恐怖

德國現在政治的特點。第一是領袖制度，其精神所在是中國古語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認為人類中有生而為領袖的，有生而為被統治的，只須由頭等領袖指揮一切，次等三等……領袖襄助他，統治大眾。這個特點，上文已略述梗概。第二特點便是殘酷無比的『褐色恐怖』（“Brown Terror”）。這種情形，在德國僅能略有所聞，因為他們也知道無入道的慘酷行為不是一件榮譽的事情，所以力守秘密；但新聞記者究是無孔不鑽的惹人厭惡的東西，像英國最著名的一種報紙——孟却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便常有確鑿事實的通訊記載。（聽說這個報在德國曾有一時禁止進口。）此文所述的事實，有的就是

撮取該報上最近數月來所記的材料。

在德國拘留政治嫌疑犯，或完全被誣，冤枉捕去的人們，都關到所謂“Concentration Camp”，在中國報上有人譯作「特別拘留所」，加上「特別」的形容詞，也許易於使人誤會爲含有「特別優待」之意，其實其中的慘酷情形，雖不一致，但大抵都無異於人間地獄；而且尋常所謂「拘留所」是待審之處，在此處則活該受罪，無審之必要！這個名詞的原字意義是「集中的營幕」，事實上就是把整千整百的被認爲有政治嫌疑的人，或不自知怎樣得罪了黨老爺的人，不由分辯地拘往聚在一處，有的住在很苦的屋子裏，有的竟是同聚在露天的大場上，好像犬豕似的。現在這種「營幕」有數十處，宛轉呻吟在這裏面的有五萬人左右，時時還有大數量的補充。這裏面最慘的是鞭撻，打得死去活來的鞭撻，打時用的鞭是牛皮做的，中間鑲着一條鋼；這種牛皮鋼鞭，也就是犯人們自己做的打的數目由廿五下至七十五下不等。從前做過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職員的，拘入

後不問有何理由，普通的規矩是先須赤身打一頓。素以模範見稱的達孝(Dachau)『集中營幕』，去年八月十八日的前一日拘進廿五個人，在這一天都毫無理由地被拉出來赤身鞭撻一頓，算是行入門禮，最悽楚的是住在附近的犯人聽着被打者的慘號的哭聲，打得昏倒過去了，有醫生打針救回來，醒後再打一！

去年七月，柏林的『祕密警察』(“Secret State Police”)抓去一個音樂家，被指爲嫌疑犯，被引入一個囚室，裏面燈光如豆，黑暗得很，有八個SS（黑衫黨員，稱防衛團，亦即國社黨員，其地位較SA即褐衫者高，穿褐衫者稱衝鋒團）在那裏等着，囚室裏面只中間有一張桌子，他被伏縛在上面，兩脚用繩縛住，兩個SS拉着他的手臂，兩個SS同時開始鞭撻，叫他招出同伴的人。他只被打四五下的時候，已痛苦難受，用手掙扎，腳上的繩被弄斷了，他用力掙起來，請他們把他立付槍決，情願速死；他們那裏肯許，綁上去再打，他痛不可當，大呼『招了！招了！』於是再打幾下之後，被拖到樓上另一個地方去，他上梯見一玻

璃窗，即打算自殺，跑上去把玻璃打破，割破手臂間的血管，SS趕上來打時，見血流如注，才把他鏑上，交給獄卒帶去，獄卒替他塗上一些藥酒，把布包紮起來。後由一個醫生很粗暴似的來驗視一下，睨視他手上的包紮和背上的傷痕，問打了幾下，獄卒答說「十五下」。

挨了種種的拷打酷刑，還有代守秘密的責任。萬一幸而得以生還，固然是應該三緘其口，就是在拘留所裏，也須守口如瓶；據說有一個「秘密警察」的警官偶而看見了一個這種犯人的面上傷痕一場糊塗，問他「爲什麼這樣？」這個犯人很不識相地回答說「我是曾經被打的」。這警官聽了，接續打他幾下，申斥道：「你胡說八道！這裏是向不打人的，不要忘記！」這個犯人趕緊低聲下氣地求饒道：「我誤會了，以爲你要知道真實的情形。現在我知道了，我是曾經跌了一次，把自己跌傷的。」

這類行爲是出於「秘密警察」和SA及SS一班人物，是國家法律所不能制

裁的，而且是不許外人知道的，可稱爲『祕密的恐怖』（“Secret Terror”）此外還有所謂『合法的』恐怖（“Legal Terror”）。因受這種號稱『合法的』恐怖而被砍頭者之多，爲德國從來所未有。因爲這些砍頭的罪還經過形式上的法律程序，所以不很受人注意，其實牠的恐怖程度並不減少，因爲這類法律是追溯已往的，有許多被認爲犯罪的事實，或甚至虛構的口實，都是在一九三二年的事情，而殘酷的新律却是去年才頒佈的，却引來責罰在未有這種法律以前所發生的事情。例如有六個工人於去年十一月在庫龍（Colonne）德國西部的一個重要城鎮）被砍頭，據說是因爲在一九三二年殺了一個褐衫黨人。其實這裏面有幾個犯人，一點沒有殺人的證據，還有其他的，法庭也無法否認他們不是出於自衛的行爲，因爲在那時各黨鬥爭的時期內，褐衫黨人謀刺別人的也不勝其數。但是這六個人的腦袋竟被砍掉，而且是用斧頭很笨拙地硬砍一陣，死得很慘。據當時目睹的人說，形狀之慘，非筆墨所能形容，所能說的，是當時這六個人都很勇敢地就死就

是了。

倫敦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駐德特派記者史德芬斯（Pembroke Ste phens）最近（本年五月底）因通訊觸怒德當局，被德當局逮捕，最後被驅逐出境。據他說在德國警局裏，曾聽到婦女的呻吟聲，又看見牆上掛着不少砍了頭鮮血淋漓的屍身相片，宛轉掙扎而死的慘狀。他便向伴着他的幾個偵探詢問，說據他在德所聞，犯人和政治犯被砍頭時，是由劊子手拿着斧頭當面向仰臥的人砍下去，他們極力否認，說並非當面，不過用鐵鏈拖到砍頭架上，由劊子手備犯人背後砍過去。其實「當面」也罷，「後面」也罷，不用槍決而用殺頭，（死非其罪還是另一問題，）殺頭不夠而還要用斧頭來亂砍一陣，這也算是日耳曼文化或文明的極端表現了！

這類恐怖，被認為「劣等種族」的猶太人固然遭劫最慘，被尊為「優秀人種」的日爾曼人也在所不免。

歷史上的大革命，雖都難免有一段恐怖時期，但像這樣無人道的慘酷情形，尤其是在文化比較進步的近代，却絕無僅有。況且說不上什麼革命，實際乾脆是反革命，這種殘酷的恐怖就簡直是向文明人類挑戰了。

一九三四，六，三，倫敦。

六〇 種族的成見和夢想

德國的『納粹』（“Nazi”）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雖同是狹義的國家主義，卽志在跑上帝國主義老路的侵略的國家主義，（這是他們的共同點。）但德國的『納粹』却有一個很大的異點，那便是更加上了很濃厚的種族的成見和由這種族成見所引出的很滑稽的夢想。

希特勒在去年十月出版了一本書，名叫我的奮鬥 (Mein Kampf)。

時，英國書坊替他大登廣告，說是「研究近代政治學者所不可」。

在這裏面除充滿了成見外，找不出什麼「政治學」來。尤其是第十一章國家和種族裏所說的話，更爲可笑。他的前提是：

「我們在這世界上所羨慕的一切——科學，藝術，技術上的能力和發明——都是很少數國家的創造的產物，而這些國家原來或者就是出於一個單獨的種族，這種文化所以能存在，全靠他們。倘若他們被毀壞，這世界上的一切的美，都被他們帶到墳墓裏去。」

這「一個單獨的種族」是什麼？他以爲：

「倘若我們把人類的種族分做三個範疇——創造者，維持者，和破壞者——那末只有亞利安這一種族可算是第一個範疇的代表者。」

這一段裏面的「只有」兩個字很可以注意；所謂「只有」，那就是不屬於亞

利安的其他種族，例如屬於『非亞利安』的塞米族 (Semite race) 的猶太人，以及有色人種的一切種族，都在排除之列。

所謂『亞利安』(“Aryan”)，原指一羣『印歐』(Indo-European) 的語言文字，這羣語言文字現在差不多遍及歐洲全部，並伸展到印度；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臘文，俄文，亞美尼亞文 (Armenian)，波斯文，以及幾種印度文。(見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P. 145) 據歷史家的推測，以為在太古時候，這羣文字也許是出於一個源流；又推測說有一羣語言的種族或者最初是由俄國南部，分散出來；有的朝東遷，到波斯印度去；有的便西入歐洲，成爲條頓，斯拉夫，和拉丁等種族。換句話說，所謂『亞利安』，統而言之，就是白種；所謂『非亞利安』，就是白種以外的其他各種族。希特勒認爲世界上所有的好東西，如科學藝術技術和發明等，都是白種人的成績，所以白種人有征服一切其他種族而單獨生存的權利。

但是事實上的困難是「亞利安」人雖有他們的文化史，而世界上其他種族——尤其是有古文化的種族——也有他們的文化史。於是希特勒和他的信徒們恨不得一手抹煞歷史。有名 Lewis 的著了一本希特勒，裏面有這句話：

「亞利安人」——「白種人」——這些人，在遠古時代（“In the remote past”），曾把文化帶到印度，而且也許（Possibly）也帶到加爾底亞（Chaldea。西亞古國，在紀元前二三〇〇年即滅，）和中國去。」

在這位捧希特勒的作者的高見，中國的五千年的古文化，也是承蒙亞利安人贈送的。了！所不勝可惜的是這位大作家還缺乏了胡適之先生的「考據癖」，僅能說出「在遠古時代」；橫直在未有歷史的荒古時代，神不知，鬼不曉，我們隨便說送了什麼，便是什麼！況且他還很謙和地用了「也許」的十分客氣的字樣。照他們的意思，大概在中國文化上不無相當位置的孔老夫子的原籍，「也許」也是亞利安罷！

去年年底有德國某「人種學者」著了一本書，大吹日爾曼人種的優越，其中可笑之處很多，尤其可笑的是把人類分爲三大種：第一種是 Mensch（優秀人種，日爾曼人種當然是在頂上的）；Untermensch（劣等人種，如南歐巴爾幹各國）；Unmensch（非人種，當然是他們所認爲有色人種所歸屬的）。記得在上海有位善於惡作劇的朋友，每喜對人說：「你這樣的人真是在人類裏所尋不出的！」不料善於體貼希特勒的「歷史家」能抬出「上帝」來；現在又有善於體貼這位「領袖」的「人種學者」，能在人類裏尋出「非人種」來！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希特勒既認爲「只有」亞利安人是能替世界創造文化，能替世界保存「美」的種族，他所積極提倡的有兩件事：一件是保全日爾曼種族的血統，在德文是所謂“Blutsgefühl”，意謂「血統的感覺」，即不許德人和有色人種或塞米族的猶太人結婚，因爲他以爲萬分寶貴的日爾曼人的血一與「劣等人民」混合起來，也要使優種變成劣種的；還有一件是提倡唯一優種的亞

利安人征服全世界，因為他認為必須如此，世界的文化才有進步。

現在德國的公務員，如三代祖宗中含有猶太血或有色人種的血，飯碗就在打破之列。因為他的祖宗裏有的「勿識相」，和猶太人或有色人種發生了性的關係，在當時尚未入世的兒子，孫子，乃至曾孫，好像都要替他負責似的！最近見德國所公布的農法（*Peasant Law*），裏面所定的農民得享的種種權利，就說明只限於「德國的公民，須自一八〇〇年以來家族中不含有猶太人的或有色人的血統者」。現在是一九三四年，距一八〇〇年是一百三十四年了，做子孫的要替百年前的祖宗的性的關係負這樣大的責任，而且是無法負責的事情，真可說是含冤莫白！

去年十月間德國證券交易所有三百十四個經紀人被准許營業，有一百五十五人被拒絕，其中有半數被拒絕的理由是因為據說他們含有「猶太血」的「劣跡」。至於名教授，科學家，著作家等，因不幸被認為祖宗裏面有的染有猶太血統「劣

跡」而被排斥驅逐者，更不可勝數；他們因為血統關係，無論在文化上有何重大的貢獻，都在所不計的了，這顯然又是血統和文化的矛盾問題！

德國排斥猶太人，是有經濟的理由，不僅是種族的問題，但種族成見既爲國社黨的重要內容之一種，故黨員中之盛氣凌人者，每發生得罪其他外國人的事，尤其是東方人。最近此種『盛氣』聽說較前衰落了。在國社黨將上台及剛上台炙手可熱的時候，有的黨員在街上見有德國女子和東方人同行的，便要詢問那女子的理由；倘若那女子是有職業的，往往因此打破飯碗。有友人某君自漢堡來柏林，據談去冬在漢堡有中國學生某君偕一德國女友在街上走，被一卍字黨員路過看見，（褐衫黨人的臂上總縛有一塊紅底白字——卍字——的布條，故亦有人叫卍字黨），盛氣斥女的爲什麼和『豬羶』同走。據說那中國學生怕事，只得忍耐過去。做了『弱大民族』的中國人當然易欺，（尋常名詞是『弱小民族』，中國並不『小』，似乎只得稱『弱大』。）別國人便沒有這樣易惹。據去年十月

二十日的孟却斯特導報所載，有個美國人名 Roland Wely 的，被兩個卍字黨員所打，（據打者的理由，是他對遊行中的卍字旗表示輕蔑之意，這當然是很含糊的話，）被美國駐德大使提出抗議，這兩個黨員各被定罪監禁六個月，各報初不登。登。載。其。事，美大使仍不答應，說此事非公布不可，然後有的報上才有這件新聞。

我在上面第五十七篇通訊裏面所提起的 E 女士，在第一次的星期日，她和 S 君在家裏將陪我出去的時候，她先和我說，倘若在途中有「希特勒的黨員」（他這樣說）問起的時候，她要說我是替 S 君在上海做推銷的生意，因此成了朋友的關係。我聽了不知怎樣本能地立刻引起不快的感覺，我回答說：「那就算了，我不去！我本來說不去，恐怕沒有工夫，後來是你們都再三請我來，我覺得不可却，才來的。」她覺我動了氣，再三陪着笑臉道歉，說他們倆都以我為好友，決沒有不願同走的道理，這不過因希特勒不講理，他們不過在事前預防罷

了。我也諒解他們的誠意，便一同出去；她一手挽着她的未婚夫，一手挽着我的臂，三人並行着，途中遇着不少卅字黨員，但都沒有過來問什麼，這算是很徼倖的。

卅字黨員中却也不是都屬浮囂的，我在德國所認識的德友裏，也有卅字黨員，他們待我都很好，其中有一人，待我尤其殷勤可感。當然，這都不過是友誼的朋友，我並不會和他們多談黨務，免得使他們爲難。

講到保全血統，在事實上確也很不容易，依我在德國的見聞，德女嫁給中國人的，或和中國人作『同居之愛』的，或在渴望嫁給中國人的，都很不少。大概他們有的只是『麵包的感覺』，很缺乏『血統的感覺』！講到『愛』，那更是和『血統』不發生連帶關係的東西。我在火車上和E女士第一次談話的時候，她也談起希特勒禁止德女嫁給外國人的事情，尤其是東方人。她說一嫁給外國人，即失德國國籍，甚至即有失業的危險。我問她假使你愛上了一個東方人，你願意

不願國籍的拋棄而出嫁嗎？她說願。我看她的『血統的感覺』，在希特勒看來也是不及格的。

德國一般人民，我覺得都很可愛，所以我對於日爾曼種族只有敬重的態度，但國社黨那樣排斥其他種族的態度，我認爲是成見；征服一切其他種族的念頭，更是夢想。

一九三四年，六，五，倫敦。

六一 經濟的難關——失業問題

關於法西斯以及加上種族成見的納粹，就制度上加以客觀的分析和判斷，記者也略有管見，想在本書全部結束時的結論上提出來談談；現在我們所要注意的

是我們無論對於何種制度，都不該存有主觀的成見，都須平心靜氣看看牠能解決當地的問題到什麼程度，以此客觀的事實爲觀察的標準，便能『思過半矣』。例如關於意大利，據國際勞動雜誌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所載，意大利農場工人的『真實工資』的指數一年少一年：一九二三年是一〇七；一九二六年是八九；一九二九年是九七；一九三一年是八七。至於失業的數目則一年多一年：一九二五年是一二二、〇〇〇；一九二七年是四一四、〇〇〇；一九三〇年是六四二、〇〇〇；一九三一年是一、一〇〇、〇〇〇。

聞風興起的德國納粹政府，對於外交除空口叫着『德國不再是第二等的國家了！』（德國退出國聯時，希特勒對國人演講中的話）。未上台前滿口答應國人必辦到取消凡爾賽和約的事情，上台後仍然沒有辦法，這姑不去說牠；未上台前滿口答應國人要把大工廠收爲國有，要沒收不勞而獲的進款。要立刻將大商店收爲市有，以低價租給一般小商人經營等等，（都載在廿五條的黨綱中，黨名裏鑲

有「社會」兩字，即以此為標榜），上台後也仍然沒有辦法，反而做了大資本家的保障，這也姑不去說牠；只就希特勒自己承認是用了全副精神對付的失業問題，有了什麼實際的成績，已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

希特勒政府是去年一月卅一日握到政權的，去年一月底的失業人數是六、〇四七、〇〇〇人；到去年十一月底，據政府公布的失業人數是三、七一四、〇〇〇。於是希特勒政府很得意地宣稱他在一年內已將失業人數減去二百三十餘萬人了。倘然這是實際的情形，不能說是沒有他的成績，問題是在實際的內容能否經得起分析的研究。

歐美各國是講科學的國家，所以對於統計上的數目字很看得重，於是統治者在宣傳上也不得不在統計的數目字上用工夫；這些數目字既是官方發表的，是否完全可靠，已有疑問。但即就這數字來說，這數字不過是官廳准許登記的失業數目，即所謂『登記的失業』（“Registered unemployed”），還有實際是失業而却不

被政府算作失業的，至少是不在登記範圍內的失業，那就被推在原來失業數字之外，不減少而減少了。例如被拘留在『集中營幕』裏面的有好幾萬人，猶太人及政治犯之逃亡出境者有六七萬人，法律不准已結婚的女子就業，這類的人雖失業而不算爲失業者，約有廿五萬人左右，都不在失業統計裏面。

此外有兩種人不是有業而却被硬算作有業的：一種是所謂『勞動服務』(Arbeitsdienst)，除作築路等工作外，大多數都送到所謂『勞動營幕』裏面去，受軍事訓練，有住宿膳食，而沒有工資，這裏面容納的約有廿五萬人。還有一種是『土地工人』(“Landhelfer”)，由政府和大地主說妥，大批地用去，只有膳食，有一些零用錢；大地主僱用工人本來要出工資，這樣一來好像添了不少農奴！據估計亦有廿五萬人左右。這兩種合計五十萬人，也都不在失業統計裏面。此外尚有三一四、〇〇〇人是所謂『救濟工人』(“Notstandsarbeiter”)，是一種『試工』，連工人應得的最低的工資也沒有，渡飢而已。這三十餘萬人也不在失

業統計裏面。連上段合計共約百萬人。

失業統計既靠不住，比較靠得住的是看看疾病保險計劃中的得業的統計，據去年十月底這項的統計是一、一四八、〇〇〇人。上面共計的百萬人也算在得業之列，一百四十八萬人中除去此數，所餘的常態工人得業的增加數目大概不能超過五十萬人。

而這五十萬人的得業，實際還是措已有職業的工人的油；把他們的工作的鐘點減少，因此也依比例地把他們的工資減少，拿來分給失業的工人。依統計所示，有工的人數雖略有增加，而總工資的數量却反而減少，這種矛盾的現象，癥結就在這裏。德國工人現在所得的『真實工資』，其低度實為德國五十年來所未有。據一位統計家很準確的統計（見今年一月十二日的“Manchester Guardian”）現在德國工人的工資，其淨得的平均數量，在去年九月間是每週二十一個馬克零六五，而工人家庭（以夫婦兩人及兩個子女計算，即以兩大兩小四人計算，）的

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是每週三十八馬克零四〇。在這些統計裏，可以看出一方面雖高唱失業人數的減少，一方面却是大措勞動者的油，使他們過着半餓的生活。

關於此點，有個很可注意的實例。據德國規模非常宏大的西門子電機廠一九三三年的營業報告，可得要點如下：（1）工人人數增加；（2）工資總數減少；（3）紅利反而增加，得百分之六；（4）全部營業及生產減少。

工人的工資既銳減，「購買力」當然也隨着銳減，於是間接又影響到必需消費品的銷路，而加緊生產過剩的困難。（相對需要的物品和奢侈品更不必說。）德國自一九二九年以來，輸入已一年一年比輸出加多，但在今年（一九三四）一月份以前，還略能出超，自今年一月份以來，索性成了入超，而且入超的程度一月比一月高！而希特勒挽救經濟恐慌的口號，（見希特勒於今年三月廿一日對全國的無線電播音的演詞），却是「政府已決定增加生產以增加大眾的購買力」；國外貿易既日減，工人的工資又銳減，試問所增加的生產往那裏去？這真是現制

度下無法解決的矛盾。

很有人讚揚希特勒的政府能大量地拿錢出來提倡公共的工程事業，尤其是築路，在上面所引的希特勒三月廿一日對全國的演詞裏，他就說今年要用六萬五千萬馬克來建築汽車路。但這種事情至多是增多了上面所謂『勞動服務』，而且這種汽車路不過是備戰之用，在現狀下決不是生產的事業。（即生產增加，也找不到出路，上文已述及。）所以這樣的辦法，是否能解決德國的經濟難關，雖還要看將來的效果，但以常識推測，已很令人懷疑。

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對經濟沒辦法，往往和婦女們爲難！這也是一幕悲喜劇！他們都要把婦女們盡量地推到家庭裏去做『家子婆』，以便騰出地位來給失業的男子，作爲減少失業的一個重要辦法。像英國就有這種傾向，聽說美國也很在那裏玩這個把戲。但是這些所謂『民主政治』的國家，雖鬼鬼祟祟地幹了一部分，嘴上却未便怎樣吹牛；而希特勒的納粹的政府，却認爲這是千萬分合理的大

事業，希特勒曾明目張膽地說：『一個婦女的地位是在廚房裏，教堂裏，和牀鋪上。』（見今年三月廿三日的“Daily Herald”）他總算很老實，把『牀鋪上』都拉了出來；不過睡覺不是婦女獨有的，男子何嘗不要睡覺！就說是夫婦一同睡覺罷，但也是兩個人的合作事業，何以只是『婦女的地位』在『牀鋪上』呢？聽說希特勒雖有電影明星做女朋友，（英國報上時常登有這個女明星的情影和行跡，大書標題曰：『希特勒的唯一女友』，並說她認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男子』，）却是未曾結婚，我就不知道他自己也用着不用着『牀鋪』。

但是無論如何，在他認為把婦女們推到『牀鋪上』去，是救濟失業的一個妙計。所以他在三月廿一日對全國發表的那篇大演說裏，也提到這件事；他說利用借款辦法，還可使二十萬婦女結婚，爲着這項借款辦法，政府已準備了一萬五千萬馬克，專作此用。

這個『借款辦法』很有趣，聽說是這樣：有業的男子要結婚的，如覺費用不

狗，可向政府借一千馬克，以後每月攤還十馬克；結婚後生了一個孩子，政府贈送二百五十馬克，如此在實際他只須歸還七百五十馬克了；如再生一孩，政府再贈送二百五十馬克，如能生四個孩子，則一千馬克即等於不必歸還。惟用此「借款」結婚的女子須對政府立證書，聲明不就任何職業。

這樣一來，不但可把許多婦女們推到「牀鋪上」去，而且還可鼓勵「早生子」，督促新婚夫婦們的特別努力！達到「政治領袖」積極提倡增加人口的目的，以便近則可為戰爭增加材料，遠則可使全世界都佈滿了「優秀人種」，可以大大地增進世界文化，所謂一舉兩得！

所可惜的是只有「有業的」才有利用這種「借款辦法」的權利，因為失業者當然更沒有「攤還」的能力。像E女士的那位未婚夫S君，雖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要正式結婚，對此「借款辦法」當然垂涎三尺，（這辦法內容的大概，就是承他告訴的，可見他自己對此事是十分的注意，）也只有「望梅」而無法「止

渴」

就經濟的立場看去，即使都把婦女們推在「牀鋪上」，繼續不斷地努力造出不少的「優秀人種」，經濟問題既沒法解決，反而增加了所得工資銳減者的負擔；況且「優秀人種」越多，工作越不夠分配，只有替業者準備「後備軍」根本上反增加了經濟的困難。所以這裏也含着不少的矛盾。

一九三四，六，六，倫敦。

六二 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

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關於教育方面有個共同點，便是所謂「雙軌制度」有一班國民受了義務教育之後，便須入職業學校受短期的職業技能訓練而藉說糊

口的；有一班國民便得一級一級地升學，養成上層階級的材料；這兩方面全以經濟的背景爲標準。德國的現行學制，當然也不能例外。德國的義務教育法定六年，實際不止六年，因六年畢業後，無論欲就何業，都須再依所擇的職業，入職業學校，其年限一二年或二三年，依業而異，否則雖有職業機會，亦沒有被僱用的希望。這六年稱爲國民教育，都是不預備升學的。預備升學的讀至第四年終了，卽入中學，這四年稱爲基本教育。中學九年，分三階段，每階段三年，有實科中學與分科中學之分。據說後期中學的程度幾等於英美大學的程度，故德國的大學程度幾等於英美的大學院程度，這不過是聽留德的朋友談起，記者沒有到過美國留學，也不曾在德國進過大學，未敢妄斷。德國大學文理科定三年，法科四年，醫科五年，但實際因功課來不及做完，每須延展。除工程師文憑外，其餘各科不畢業則已，畢業了都是博士，據說博士尙有一二三四等之分。我笑語一位留德的朋友說，博士既有四等程度之分，我們稱人博士最好還要分清「頭等博士」

「二等博士」等等，不過如有人是「四等博士」，也許不願聽！

有錢人家的女兒受滿義務教育後，往往不再入學校，請私人教師到家裏來教外國文學音樂等等，以養成上層階級的主婦爲主旨。有錢家族的男子則又不同，以學位爲社會所重視，（德語稱博士爲「博士先生」“Herr Dr.”）也勉強入大學，惟注意於選擇容易的科目和比較易與的教授。這是無意求高等教育而進大學的青年，所靠的當然就是他。有錢，真肯求學的，大概還是中產階級的子弟。（無產階級的子弟無論真肯不真肯，當然都說不到。）從前還有苦學生得一面任事，一面求學，現在已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德國的中學生只須中學畢業考試及格後，升大學即可不必再考。本來每年中學畢業的學生有三四萬人。同時也就是升入大學的有三四萬人。今年不同了，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開宗明義第一章是限制升學的人數。今年一月間已由政府宣布在全國已有資格升入大學的青年（即中學畢業考試已及格的）裏面，只准許

一萬五千人得升入大學，工業學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機關。因此有兩萬三千人已經中學畢業而原有資格入大學的青年，今年都在失學之列！

此外女子被准許升入大學的數量，只佔全數中百分之十。這理由當然不是因為女子沒有升學的能力，她們所以得不到平等的機會，很顯然的理由是當局千方百計要把她們推到『牀鋪上』去，他們認為女子如受了過多的教育，不很願意被人限制在『牀鋪上』，這樣一面要增加失業的人數，一面要減少『優秀人種』，這和獎勵出嫁養子的原則不合的，所以於限制升學之中，更須加緊地限制女子升學！這是納粹統治下的教育的第二種重要的主張！

盡量把婦女們推到『牀鋪上』，這算是把婦女問題解決（？）了；但是那兩三萬預備升學而不許升學的『優秀人種』，當局對他們怎麼辦呢？當局答應他們組織失業委員會，和教育機關合作，設法把他們介紹到工商界裏去服務。德國失業情形的緊張，我在上篇通訊裏已略述梗概，這個『失業委員會』有何廣大的神

通，能把這幾萬的新產生的失學而又失業者，介紹到工商界去，這似乎也還是個問題罷。

其次請問那已被准許升學的一萬五千人，是用什麼作標準來選擇的？據當局所宣布，於什麼智慧，體格，品性，等等條件之外，還加上一個條件叫做『民族的可靠性』（“National reliability”）——換句話說，這升學候補者必須是個『純粹』，或是現統治階級的『敬佩者』（“Admirer”）。所以聽說實際上只有納粹黨員才有升學的權利。這可算是納粹統治下的教育的第三種重要的主張！

據當局的意思，將來這種升學人數的限制還要嚴，還要減少，以達到需要和供給能『平衡』為止。照現狀看去，失業者遍地皆是，簡直無需要之可言，恐怕非減少至零數不可；可是一方面又有許多『優秀人種』層出不窮，不能束之高閣，這似乎又是個難問題。

至於爲什麼要把升學的人數嚴格地減少，據當局的解釋，也很不免矛盾。他

們一方面舉出事實證明『沒有麵包的畢業生軍』“Army of graduates without bread”之日增，而專業位置之不敷分配。據說在一九一一年，全德國有六萬二千大學生（其中有二千三百女生）；在一九三一年，有十二萬三千大學生（其中有一萬九千七百女生）。他們估計，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將有比實際位置所能容納的多出兩三倍的博士。在一九三一年，有八百個至九百個的青年化學師（都有藥科的專門資格）；而現在却有一千二百個至一千三百個藥劑師求業而不可得。照他們這樣的推論，是供給多於需要。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說所以要限制升學人數的理由，是因為『錯誤的教育理想』使學校離開了服務人民的工作。這樣說來，只要所輸的知識是合於當局所認為準確的『教育理想』，這缺憾便可避免了。但是像上面所舉的許多『生產過剩』的藥劑師，還是因為在現狀下的經濟結構使他們得不到職業呢？還是他們在藥科的知識和技能上有什麼不合於『教育理想』呢？這問題的癥結如果不弄清

楚，要想救濟，更不容易了。

聽說不但升入大學的人數要受限制，升入中學的人數也將要受限制，這豈不成了限制主義的教育嗎！

這是納粹統治下的教育的最近傾向。

一九三四，六，六，倫敦。

六三 德國新聞業的今昔

德國的重要報紙，就大概說，本來是操縱於幾個托辣斯，其中就其鼎鼎大名的有三個，而這三個之中，猶太人包辦了兩個。這兩個原來都是擁護社會民主黨的。一個名叫烏斯太音（Ullstein），資本一萬萬馬克，可想見其規模的宏偉；所

辦的幾種日報和定期刊物，都是風行一時，名聞世界的。例如最近（本年三月）因受種種壓迫而停刊的獲惜協日報（“Vossische Zeitung”）就有兩百年的歷史，在各國老資格的報紙中有『獲惜姑母』（“Auntie Voss”）的著名綽號。現在這個『姑母』不幸因環境的壓迫，而送了一條老命，西歐提倡自由思想的報紙多表示悼惜；這個不久壽終正寢的『姑母』，她就出身於烏斯太音。該公司所辦的柏林午報（“B. Z. am Mittag”）是德國午報中的大王；所辦的柏林畫報（“Berliner Illustrierte”，是週報），每期銷數在百萬份以上，所享盛名僅次於倫敦新聞畫報（London News Illustrated”）。

還有一個猶太人辦的大規模的報業托辣斯，名叫盧篤福摩塞（Rudolf Mosse）資本五十萬馬克。該公司所出的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在國外尤為流行，一部份原因是因為所印的字體是用英文字體的寫法，不是用德文字體的寫法，外國人便於閱看；聽說這報在德國本國的銷數僅三分之一，售到國外的反佔

三分之二。此外該公司還出有兩種有名的晚報。

第三個著名的報業托辣斯名叫協爾 (Scherl)，是德國大資本家許根堡所辦的 (Dr. Hugenberg，演攝侮辱中國人電影的烏發公司也是他辦的)。該公司資本約自一千五百萬至一千七百萬馬克。所出的本埠日報 ("Lokal-Anzeiger") 和盧篤福摩塞所出的柏林日報並駕齊驅，此外也辦了兩種有名的晚報。

除這三個大托辣斯所辦的報外，還有個日報叫做德國普報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算是能比較立於超然的地位說話，於德國輿論界原有相當的地位，對中國的態度比較地最好。(這報記者也去參觀過，並和該報政治部主任晤談過，但沒有什麼特點可記。)但實際也並非真是超然的，因為牠的後台老闆是德國實業聯合會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該會會長便是大資本家克虜伯。(克虜伯鋼鐵廠是我們所常聽見的)。大概要和中國做生意的團體，對中國的態度都比較地好些，英國的孟却斯特導報也是一例。在我們當

然。只。有。自。己。爭。氣。奮。鬥，不。願。存。有。苛。求。於。別。人。的。意。思，而。且。也。不。應。存。有。苛。求。於。別。人。的。意。思——再。進。一。步。說，自。己。如。不。努。力，苛。求。於。人。也。是。無。用。的。

最後還要附帶提到的是納粹的兩個比較最著名的黨報：一個是德國現任宣傳部長炙手可熱的人物葛伯爾斯博士(Dr. Göbbels)所辦的進攻晚報(Angriff)；一個是人民觀察日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

這當然是很簡單的大概。據德國新聞學研究院(Deutsches Institut für Zeitungskunde)的調查，在一九三二年(即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全德國的日報有四千七百零三家之多，其中黨報(各黨的)約近千家，凡黨報而對某黨特別接近與同情的約有一千二百餘家，超然的報約有二千零數十家，(這裏有一點也很可注意，就是各聽任自然的發展，超然的報特別多。)可見情形很複雜；不過我覺得這類材料的敘述如果過多，讀者也許要感到枯燥乏味，所以只很簡要地說了一些，現在讓我談談參觀烏斯太音所得的印象。

烏斯太音算是在德國規模最宏大的出版及印刷機關，該公司的房子分兩處；一處在柏林的柯曷街（Kochstrasse），是編輯部，各事務部，及所辦的各種日報的出版處所在，可稱老屋；一處在柏林附近的騰迫荷福（Tempelhof），是較新的大印刷所，專印定期刊物和叢書，所印的都是該公司自出的刊物，沒有工夫接受外面的生意。記者偕同友人張博士也分兩次去參觀。於三月卅一日先去該公司的老屋，屋分四層，雖非印刷所，因為有印報的關係，也有四五十架輪轉印刷機，每小時都可印兩萬份的通常日報。此外有一架最新式的印刷機，每小時可印三萬份，而且印時一點沒有機聲隆隆的聲音，裝在印機房的中央部分，看上去巍巍然好像南面王似的。但是因為生意清淡，四年來竟沒有開用的機會，那樣好的一部印機，就只得讓牠那樣賦閒着！各報的編輯處和發行部的辦事處，都依類聚在一處；例如有個全層的樓房都用作發行部，各報的發行部雖同在一層，彼此用玻璃牆隔開，櫃台和行人甬道則聯成一長條。大量生產經濟，這樣『大』辦公。

也有牠的經濟處。該公司全部職工最盛時代達一萬二千人，現在只有七千人，這裏面就替德國留下了失業者五千人。職員中女子過半數，包裹間的工人，女子亦過半數。職工出入上下者既多，所用的電梯也很特別。兩個電梯在貼隔壁，電梯上立人的那個小房間不止一個，是幾個疊着同時上上下下的。這兩個隔壁成鄰的電梯，一邊繼續不斷地向上升，一邊繼續不斷地向下降，兩個電梯的門是一直開着的，兩邊一升一降地循環動着不停，所以沒有人開梯，也沒有人關梯；你要上樓或下樓，一鑽進去就是！

各報的新聞照片貯藏處也聚在一處，所以非常經濟。走進這個貯藏處，只看見四方八面的牆上都是許多小櫥，好像中國的大規模的藥材店似的（因藥材店滿壁都裝着放藥的小抽屜），不過這些小櫥不是用木做的，是用鋁做的，大概是要防潮溼的用意。該處共藏有新開照片七八十萬張，所用的管理員都是女的。我和張博士進去參觀的時候，引導參觀者問我們要不要試取什麼中國的名人照片看

看，我們就問他們取看「孫逸仙博士」的照片。有個女職員在索引卡片上一翻，不到一兩分鐘，即拿到一疊孫中山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在海外攝的，大概還是在同盟會時代；有一張是和夫人宋女士同攝者，大概是在日本時候攝的；有一張是辛亥時在南京臨時政府時代攝的；有一張是在南京國葬時的照片；孫夫人也在內；還有一張是兩個穿着黑色男子學生裝而不失女子態的青年，據說是孫博士的兩個女兒，這在國內却是從未見過的。看完了「孫逸仙博士」之後，引導者詢問還有什麼人要看沒有。我們都躊躇了一下，因為替我們丟臉的中國軍閥官僚的照片，在他們貯藏室的，想也不少，這在他們也未嘗不可認為有新聞的價值，但我們却不願看他們的那副不要臉的臉！既而張博士忽想起李鴻章來，牠們一聽見，好像就很熟悉似的，說這是較老的照片，跑到樓上去查，也不過一兩分鐘就拿了來，我們都驚歎其敏速。一看這位老李的照片有兩張，都是一九〇一年的，是三十幾年前的老古董了。在一張裏這位老李在中央堂而皇之坐著穿的似

乎是欽差大臣的官服，（這名詞似乎很生，但中國大人老爺們穿的蟒袍補褂，又不好竟叫禮服，）左右有幾個穿官服的隨員恭而且敬的立着，在這幾個隨員裏還有兩三個似乎是『洋鬼子』，怪好看！在還有一張裏，老李穿着寬袍大袖的便服，似乎是和他的家裏的人同拍的（都是男子），他老人家也是老氣橫秋地坐着，其餘的都是立着。看了這老頭兒當時的氣概，使人慚然感到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國勢每況愈下的不堪回首！看後出來，我問張博士何以忽然想起李鴻章來了，他說德國人把李鴻章比俾斯麥，至今還有人想起他，（按俾斯麥對中國人物最佩服的是李鴻章，）甚至有人弄錯了，以為李鴻章是姓章，每遇着中國學生裏有姓章或姓張的，以為這便是李鴻章的後代，往往問起李鴻章如何如何！

該公司有自備的電話接線處，內部相通的電話線有九百根，與外面相通的電話線有一百四十根，電話接線處用的是女接線生，有二十餘人，耳朵上掛着兩個聽機，手上把機鈕撥來插去，工作異常緊張。我看見這裏面有個女子年紀似乎很

老了，頭髮已斑白，嘴已癩，皮已皺，也在那裏很緊張地當接線生，不得一秒鐘的休息，心爲惘然！

校對室裏很有趣，校對者兩人一桌，一排一排坐着，看上去總有百人左右，好像上課似的，真可叫做『大量』的校對！

最初在該公司的總辦公室裏接洽的時候，出來週旋的是兩個三四十歲及四五十歲的女子，看他們辦公桌上排着的名牌，還寫着 F. L. 某某，(Framlin 之縮寫，即密斯某某，)我對張博士說這又是『老小姐』了，到歐洲以來，看見『老小姐』遍地皆是，怪可憐！但是想到中國的『老小姐』更可憐，因爲歐洲的『老小姐』雖做了『老小姐』，却未嘗沒有和她們的『男朋友』享過性的生活，中國的『老小姐』才真是『老小姐』，我認爲這是人生很不幸的悲劇！

話又忽然說得離題太遠了，下面再略述關於該公司的大印刷所的情形。

記者和張博士於四月三日到騰迫荷福去參觀烏斯太音的大印刷所。上次去參

觀該公司的老屋，整整費了兩小時的時間；這次去參觀該公司的大印刷所，整整費了四個小時半的時間。

進門後，有個很大很厚的簽字簿，是預備參觀者簽字的，上面已簽字的以日本和美國人爲最多，中國人來過的很少，只有一兩個，而且是學生。

這印刷所有九層，兩層在地下，七層在地上。中央的鐘樓有十六層，二百三十五尺高，在這鐘樓的第十四層和第十五層，裝設有自備自來水的高度壓力管。這樓上大鐘的鐘面直徑有二十三尺半闊，是在全德國最大的。許多電梯的電梯間，每間同時可乘二十四人。

印刷所的工作不僅是印刷而已，在一本書或一冊雜誌未達到印刷機以前，還須經過不少的手續：例如要排字，（外國排字是用打字機式的機器，便利得很，通訊裏已談及。）要製圖，照相，製版等等；印後還須經過摺疊，裝訂，裁平等。彩色的印刷物所經過的手續更煩。這種種方面都分部的辦，即印刷本身，也

分成三部：一是陽文印刷部，一是陰文印刷部，一是影寫版印刷部。此外還有各種試驗室，所用的材料都須先經過試驗室的試驗。各部詳細的敘述，非篇幅所許，我只得撮舉幾點來談談。

照相部的暗室，用不着關門而仍是黑暗的，因為裏面的構造曲曲折折由工程師特為設計造的，所以光線經了相當曲折，你雖開着門工作，牠無從進來。

進圖畫室去，看見幾十個畫師在斜靠着的畫版上繪畫，好像跨進了什麼美術學校。

有二十二架輪轉機，專印柏林畫報，每星期所印數量，在一百八十萬冊以上。

專印定期刊的印機，每月所印在九百萬冊以上。

最有趣的是在第二層樓裝訂部裏所見的自動裝訂機，機長八十九尺，一本厚書或一冊厚雜誌在未裝訂前的各部分，如插圖封面各頁等等，各放在機上相當的

地方，牠能自動地把各物搜集起來，按序拼好疊好運送到機上。一處裝好訂好，最後又會自動地把這些裝訂好的冊子運送到裁機（Cutting machine）上去裁平，這裁機每小時能裁完厚書（例如該公司所出的每冊一百四十四頁的“Uhu”雜誌）一萬二千本。

彩色的印刷機，有三色有四色的，該廠裏還有一架六色輪轉機，在印刷間裏昂然獨霸一方，數年來也因為生意蕭條，成爲廢物，和上面所說的每小時可印三萬份報紙的最新輪轉機，陷於同樣的命運！

我看完了這樣大規模的出版機關，心裏暗作妄想，如中國有一天眞實行了社會主義，或至少眞向着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走，由大衆化的國家辦理這類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區區小子，得在這樣的一個機關裏竭其微力，盡我全部的生命在這裏面，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這樣大衆化的事業，比之操在資本家的手裏，以牟利爲前提的事業，又大大地不同了。

因爲烏斯太音一向在德國出版界和報界都很佔勢力，也許可視爲一種代表典型，所以談了一大堆，現請轉回來再稍稍談到德國一般新聞業的現狀。

這大概是諸君所可以猜想得到的，現在德國的報紙，已全成了納粹政府宣傳部的附屬機關。德國原有新聞業協會，由各報公舉主席，希特勒上台後，卽『收爲國有』，廢除原有主席，由宣傳部新聞科派人充主席，每晚開會，由各報派代表出席，靜聽政府中人演說！要從事新聞業的須經政府認爲『無礙』後，加入該會，略一不如意，卽被開除出會，卽等於永遠打破飯碗，從此不許在新聞業上做事。新聞記者——無論是主筆或訪員——都變成了道地十足的應聲蟲留聲機！

遇有國際上或本國裏有何重大事件發生，只要是稍稍不合於統治階級的口味的，報上一些不許洩漏，評論更不必說，德國人便如蒙在鼓裏，莫名其妙。結果有許多人覺得本國報沒有什麼看頭，要找些真消息的，只有向外國報上去看看。但是一般人民不是都懂得外國文的，一般人民不是都有能力看外國報的，於是便等於

愚民政策——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不管是非，只顧一致，新聞既是『一鼻孔出氣』，言論也須『一鼻孔出氣』，結果當然不免單調，這不僅是一般讀者的感覺，就是等於德國報界的頂頭上司宣傳部長葛伯爾斯博士，最近對於德國報紙的單調也表示不滿意。有個星期日報名叫『Grüne Post』（德國著名的報紙之一，亦為烏斯太音所有）的主筆在社論裏，對這位宣傳部長的不滿意，略為報界辯護了幾句，被罰停刊三個月（此為本年五月初的事情），罪名是『不負責的曲解』，這在我們中國話說來，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記者曾到德國新聞學研究院去參觀，和該院院長兼教授徒費法特博士（Dr. Emil Dovifat）談過兩次。我曾提出新聞學上幾個問題和他討論，其中有一個是言論自由問題，他認為言論自由，在原則上他是贊成的，不過在革命過程時期，此自由不得有有限制，等到革命成功之後，再可開放。我說這就要看所謂『革命』

是。否。真。正。革。命。，倘。若。自。己。在。口。頭。上。叫。着『革。命』，在。實。際。上。是。反。革。命。，反。而。要。壓。迫。真。正。革。命。的。言。論。——真。正。為。大。衆。謀。利。益。的。言。論。——那。便。是。自。掘。墳。墓。的。行。爲。了。。

（納粹不但自命『革命』，其宣傳部長並宣言納粹所行的是『實際的社會主義』。）

這位老教授不敢再說下去，我也不願使他爲難，便轉着語鋒到別的討論上面

一九三四，六，七，倫敦。

六四 南德巡禮

記者於四月六日下午乘一點三十六分火車離開柏林，兩點到萊城(Leipzig)，承友人周景愈君到站照拂。周君擔任萊城大學東方學院中國文講師，在德十年，專研哲學，一望而知爲學養淵深的學者。我們相見後，除交換關於德國的感想

外，大談哲學問題。萊城雖爲德國中部名城，但街道上行人稀少，氣象靜穆，已遠非柏林之急迫塵囂可比，所以連日偕同奔走參觀，而在途中步行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却好像一直開着談話會！

到的當天下午，記者就和周君同往參觀戰勝拿破崙紀念碑。（德文原名爲 Völkerschlacht-Denkmal，可譯聯軍戰役紀念碑。）這紀念碑是紀念一八一三年普魯士，俄國，奧國和瑞典等的聯軍戰敗拿破崙於該地而建立的。當時拿破崙率軍十八萬人，聯軍達二十七萬五千人，兩方人數共在四十五萬人以上，不能不算是一場大戰了。連打四天，才決勝負，拿破崙終於不得不率領着殘軍退出德國。這個紀念碑雖名爲碑，其實不止是個碑，好像是個大石塔，在一個十八尺高的小墩上，前面臨着一個大池塘，石塔本身有三百尺高，石塔前面有兩百尺闊，由石門入內，登五百石級，得窺全城遠景。內部高亦兩百尺，有奇大無比的四大石像，象徵勇敢，自我犧牲，信仰，和民族的力量。每一石像有三丈高，（坐

着的)手指。一個。有。四。尺。長，脚。一。隻。有。七。尺。長，頭。一。個。有。三。萬。斤。重。這紀念碑開始建造於一八九八年，十五年才造成，用石六萬萬磅，用費六萬萬馬克。可以算一個「大」字！上海話有所謂「躉大」，「大」的東西看去確有些「躉」氣！我對周君說，我們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真正廢除後，也要用一種「躉」而且「大」的建築物來紀念牠一下！

第二天(四月七日)上午參觀德國圖書館 (Deutsche Bucherei) 和大理院 (Reichsgericht)。

◎ 這個德國圖書館是德國南方的一個最重要的，凡是用德文著的書報，無論在國內外發行的，都搜藏在裏面，尤以每年編行兩次的最完備的圖書目錄爲其特色。該館開始建築於一九一三年，在歐戰困難期中仍努力進行，一九一六年居然完成。建築費用去二百萬馬克，每年經費需二十五萬馬克，辦事者一百五十人。現有藏書百萬餘卷，將來逐漸擴充，可藏三四千萬卷。第一層最大的閱書室裏可

坐五百人，這閱書室裏所有定期刊物達兩萬種以上。據說每天讀者人數約自一千二百人至一千五百人。但看該館所備統計表，自一九三〇年以後，讀者的每年總數，一年比一年減少。我們知道世界經濟恐慌是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的，剛開始的第一年中也許還見不到影響，從第二年起，影響便很明顯。可見精神的滋養料固重要，而麵包問題更重要。

歐洲各國對於大理院的建築，大都特別考究，萊城的大理院既爲全德國的最高法院，其建築之堂皇富麗，那是不消說的，該院的中央高頂就有二百二十尺高。我們進去參觀時，正在審問一個共產黨的案子，我們旁聽了半小時，受審的那個共產黨員兩旁有兩個警察夾着坐，森嚴得什麼似的。但是在那樣美術化的法庭，旁觀者却好像在那裏看戲。不過大理院雖巍然存在，現在留下的效力有多少，倒是個很大的問題。納粹得勢之後，穿着褐衫或黑衣的黨員，隨便可以抓人，隨便可以處罰，已不知置法院於何地，最近於五月三日索性另立所謂「人民

裁判法庭』（“People's Tribunal”），每院五個法官，均直接由希特勒委任，專司判定有礙於『納粹國家』行動的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刑罰，以期迅速了事，且不得上訴。這樣一來，大理院當然可以空閒許多，被認為該死的也可以死得多些快些，橫直無須有什麼『上訴』的麻煩手續，說你該死就該死，多麼痛快！

中午承周君和他的未婚夫人韓女士（奧國人）請在一個有四百年歷史的『地下菜館』（Auerbachskeller）吃午餐，這菜館完全在地窖裏，從前德國名詩人歌德（Goethe）屢次在這裏喝酒，這菜館便因此大著名，至今還把當時歌德用的玻璃酒杯特別裝置在一個玻璃櫃裏，以供後來的酒徒欣賞。歌德的名著浮士德（*Faust*）中的人物浮士德，據說當時確有其人，也到過這菜館裏喝過酒，他所用的酒桶，至今還在，另在一室佈置着浮士德中的一幕，以供衆覽。這菜館竟把已死的歌德做『招徠工具』了！

午餐後韓女士請我們同到她的大學女生宿舍裏喝她自備的咖啡。她是會來

中國講學的德國哲學家杜里舒的內姪女，萊城大學醫科高材生，專研婦女兒童科，那幾天正在應考德國國家博士學位。周君在杜里舒家裏遇着她，做了一年多的朋友，因通信研究人生觀而成了知己，將來中國多着一位良醫，却也是一件好事。

下午五時許周君帶我去看一位『中國迷』的萊城大學東方學院教授愛吉士，(Prof. Dr. Eduard Erkes) 號好古。他是個德國人，研究中國國學已二十年，聽說對於訓詁學很有工夫，曾隨周君到中國住北平一年，穿中國衣服，過中國人的生活，和周君換帖，稱呼周君的老太爺做『老伯』，能說中國國語，雖不見得很流利，但已可完全達意，能夾在中國朋友中談天，已很不容易了。滿書房裏都是中國的線裝書。他覺得德國什麼都不好，中國便什麼都是好的。他尤其念念不忘的是中國浴堂裏的擦背，他說真舒服，在歐洲無論如何享不着這樣的福氣！外國人喝茶必須加糖，有的還要加上牛奶，他却只喜歡照中國的喝法，光喝茶，不

加什麼，喝的是中國的很小杯子的龍井茶，他說加了糖就喝不來，他還想到中國來做中國人。

萊城向以德國的書業中心著名，書店有一百零十五家之多，有的街上就接連的開着，好像上海石路的衣莊店一樣，容納僱員八千四百人；大小印刷所亦有一千零廿六家，容納職工三萬四千人。但據周君說近年來生意都很蕭條，此業中人叫苦連天。其實書業恐慌隨着經濟恐慌而俱來，這也是很自然的趨勢；因為餓着肚子看書，誰也難於堅持到底的！

歐洲各名城——至少是記者所曾經過的若干名城——都不免有『野雞』點綴着，萊城既是名城之一，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有一個特色，那便是不但有『雞』，而且有『老雞』！這些『老雞』因為無他法苟延殘喘，雖到了四五十歲以上的『雞』，還須塗脂抹粉，在門口尋生意，只須數十分尼（幾毛錢），就得『老風一度』（此處實在加不上一個『春』字了）。周君偶然談起這件事，也在

晚間帶我到那幾條類乎倫敦的『東倫敦』的街上去『巡禮』一下，只得說一句不。忍卒視。我問周君這樣的『老風』誰要？他說得不到『春風』的可憐蟲，『老風』也要！

有一夜我獨自一人回旅館，途中經過這類街道的附近，有一隻『老雞』向我低聲呼喚，我加速度向前直趨，還聽見她——也許只好說是牠——狠聲用德語罵我一聲『豬彘』（“Schwein！”）——

四月八日，記者於下午乘着一點十四分的火車離開了『老雞』的名城，於未到門興（München）以前，順途先灣到一個小城名叫愛郎根（Erlangen）的，去看看同船同艙出國而又同遊意大利的朋友周洪熙君。當日下午六點十一分到愛郎根。這僅是居民不過三四萬人的大縣城，中國人來的很少，本地人所看見的中國人當然也極有限，覺得中國不是姓陳的，便是姓張的，要沒便是姓周的，所以有時街上兒童們遇見了中國人，便叫你做『陳張周』！（“Chen-Chang-Chow”）這

也。算。是。就。他。們。所。見。識。到。的。範。圍。下。的。判。斷。

到愛郎根後，曾和周君及另一位對中國特別有好感的德國朋友梅雪爾君，同乘着一兩小時的火車，到附近一個小名城 *Nurnberg* 去遊覽了一天。該城約有三十萬人口，是中世紀留下來的未經改變的古城，古的城池，古的城堡，古的教堂，古的房屋，古的街道，可謂盡古色古香的能事，在德國各城中確有其特有的氣象。我們到了一個五百年留下的，據說差不多是原樣子的菜館，吃了一頓飯。這菜館就只有兩個小房間，每間大概只有十尺左右寬，二十尺左右深的小地方，每間擺着兩三張小桌子，擠做一團，而却是遊客必到之地，尤其是因為有各國不少的名人到過。備有兩大厚本的來賓題詞的簿子，裏面各國文字都有，獨缺中國字，所以我雖非名人，也寫上幾句中國字以留紀念。周君也隨着寫了幾句中國字；梅雪爾君正在學中國文，也叫我替他擬幾句話，他照抄在上面。該館以臘腸為最膾炙人口，（味道的確特別的好，係中國菜的好味道，不像外國大菜裏的東

西，)但很小，還不及中國式的臘腸一半大，而且一盤只有兩根放在一堆蘿蔔絲上面。這本題詞的簿子裏，有人題着英德法等國文字的詩，多同聲稱讚臘腸的美味，但也都嫌小而且少。我們望着盤上兩根『短小精悍』的臘腸，看看簿上的題詩，念着吃着，都不禁失笑。也許他們有意叫人吃得少，覺得味道更美，橫直他們的生意實在好，不在乎。

四月十三日上午乘九點廿八分車，十二點五十分到門興。到後承蒙從前同遊意大利的朋友李汝照汝亮昆仲和新到德國學習電學的王輔世君同來陪伴同遊，很不寂寞。到門興後，第一印象是所見的男男女女，都和北德所見的不同——都不及北德的男女生得美，老實的樣子和有些土頭土腦的樣子，隨處活躍着。門興是巴伐利亞邦 (Bavaria) 的首都，納粹的發源地，有該黨總部稱『褐色屋』，現在也是實行『褐色恐怖』的一個大本營。該處的德國博物館 (Deutsches Museum) 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博物館，裏面繞走着觀覽的行人道有一萬五千米達長(約等

三十里路)。據說僅僅快走一遍要三小時。其中尤其宏偉的是關於開礦(煤礦)工作的部分，在大地穹裏佈置着大規模的煤礦內部及工作的種種情形，和真的一樣，工作的工人就用人一樣大的模型；僅僅許多大整塊的煤，當時如何運來布置，就須很大的工程了。

四月十五日上午乘八點十八分車離門興，下午三點十分到德國西部之佛城(Frankfurt a. Main)，承丁文淵君照拂，偕同參觀了兩個報館，一個是國際聞名的老資格的佛城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素以經濟消息及評論擅長，現在「一鼻孔出氣」之下，也已奄奄無生氣了；一個是納粹的本地黨報，是沒收了從前社會民主黨的報館辦的，所以館址及設備都頗完備。此外還看了歌德故居，他原出身有錢的人家，所以房屋和設備都講究，現在是空着專備人遊覽(要買門票)。這位文學家並兼戀愛家，他的房間裏壁上，還掛有他的餅頭和女朋友的

像

被压迫的人民，只有真心認清压迫人的面孔。

原书缺页 125-末